



2009年12月20日第29期

总第三十九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本期目录

书评与序跋

[陆小宝 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唐金鹤 《倒下的英才》作者序](#)

史林一叶

[舒云 关于“毛泽东1965年春只身到空34师”](#)

[陈益南 关于毛泽东1965年春到西郊机场的时间](#)

蓦然回首

[陈虹 寻人启事](#)

博客文选

[吴越 我的传奇性婚姻故事](#)

闲读偶记

[胡庄子 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

故纸堆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的两篇大字报](#)

友情链接

[李乾 良知的坚守者——写给如梦轩](#)

简讯

[司马清扬 《新发现的周恩来》即将出版](#)

编读往来

[1、庄菁瑞来函谈家庭专辑](#) [2、赵晓铃来函谈家庭专辑](#)

- [3、马文蔚赐函简评本刊](#)      [4、顾训中给《记忆》的建议](#)  
[5、《记忆》编辑的答复](#)
- 

【书评与序跋】

## [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陆小宝](#)

清华校友唐金鹤同学花了数年的功夫，用血泪写下了《倒下的英才》一书，她要我写一篇读后感。这篇读后感我写得很艰难、很痛苦，几度彻夜失眠，几番停笔掩泣。因为这本书写的清华百日武斗，是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心中永远的伤痛。

清华百日武斗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说它重大，原因有三条：第一，它作为文革中的武斗典型，曾经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在武斗规模上，它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全国最高学府，历时三个月，死伤数百人，战况十分惨烈。尤其是 530 一仗，双方近千名现代大学生，身穿护甲，手持长矛，在东大操场摆开原始阵形，血淋淋地相互搏杀，实在是惊心动魄。第二，它是全国文革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清华武斗进行到 1968 年 7 月 27 日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导致轰轰烈烈、历时两年多的文革群众运动的全面终结。第三，文革历史的研究中，不少专家对清华百日武斗产生了诸多疑问，比如，到底是什么动机驱使清华同学之间的拼死搏杀；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精英为什么会如此丧失人性；中央最高层，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清华武斗和 727 的事件中，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至今尚无人能够作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有关清华百日武斗的书籍已经有了几本。其中最早的，是著名美国作家韩丁 1972 年出版的《Hundred Day War》，译名为《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清华百日武斗”这一历史名词，大概就肇始于韩丁。2003 年，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出版了《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

大武斗”》一书，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04年，清华文革中四一四派头头沈如槐出版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其中第六章“百日武斗”，长达百页，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除了出版物之外，涉及清华武斗的其它媒体也不乏其例，如香港凤凰卫视就曾派出相当规模的记者阵容，在清华大学驻守了三个月，专门采访、编辑有关清华文革的电视节目，并早在海内外播出。

继这些文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文革头头之后，现在，2009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唐金鹤又写成了《倒下的英才》一书。这个唐金鹤究系何人？她有什么资格来写清华武斗？她写的书又有着什么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呢？

本书中，第二部第一节的标题为“我算老几”。在清华文革中，唐金鹤只是一个普通群众，对写清华武斗这样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看来连她自己都有点发怯。更有甚者，本书中唐金鹤不经意地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她竟将当时几乎每个小学生都能倒背如流的毛泽东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硬是读成了“当年鏖战急”。看来，唐金鹤这个清华大学工科专业的优等生，她的文学素养和政治敏感度，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但是，超乎寻常的是，唐金鹤的书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几年前，《倒下的英才》曾在互联网“美国在线”上刊载，吸引和感动了一大片知识分子网民，大家争相传寄，在某些读者圈中竟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我本人就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在网上最初读了《倒下的英才》，然后又将它介绍给了几位清华同学。毕业后，我同唐金鹤四十年未通消息，主要也由于这个原因，互相找到并恢复了联系。

现在出版的这本书，作者在网上版《倒下的英才》的基础上，花了三年多的功夫，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使得内容更加丰满，证据更加充实，叙述也更加真切。我一遍一遍地阅读书稿，几乎每次读的时候，都有一种撕心裂肺的临在感觉。而读后，我又几乎每次都陷入了无尽沉痛的历史思考。在我这个清华武斗的直接见证人看来，唐金鹤的书有着特殊的文字震撼力，也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但她是工程师。她以一个工程师的方式，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但她是亲历者。她以一个亲历者的感

受，复原了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唐金鹤不是政论家，但她是有四个孙儿的老祖母。她以一个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了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复原了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 以工程师的方式复原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

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历史类读物，戏说的成份过于浓重，大多已经与原本意义上的历史不相搭界。即便是较为认真的历史出版物，往往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摆脱不了报告文学的套路，文艺腔太重，以文学描写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事实。这种半真半假的历史著作，无法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无法取信于后人，更无助于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沉痛的历史教训。不客气地说，我看到的回忆清华文革的文章，不少是趋时之作，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当时的历史情境。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她是一位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工程师。工程师的工作方式，事事都得有可靠事实根据，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臆造发挥。这种工程师的素养，唐金鹤在写作《倒下的英才》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倒下的英才》有两个部分，上部叫“清华园文革记事”，下部叫“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两个部分都是写清华武斗的，只是上部以搜集和记录武斗亲历者的回忆为主，下部以她本人的亲身经历为主。严格说起来，这两个部分都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工程师办事的特点是：有所不言，言必由实。在本书中，作者不勉强地去概述百日武斗的全过程，而是把着重点放在 530 大战，以及团、四两派武斗伤亡牺牲者的具体情境中。凡是她所记的内容，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调查核实。据我所知，为了写作本书，作者几次从美国专程飞回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地，对当事人进行采访调查，并将书中所记的事发地点一一寻踪确定，实地拍下照片。另外，她还打了无数次长达几个钟头的越洋电话。本书采访的主要叙述者之一郑楚鸿，是唐金鹤的丈夫，香港工程师协会的会员（MHKIE），注册的机械工程师（R.P.E）。他是清华同学中公认的实诚之人。他虽然不写日记，但是几十年来对自己的每天所为都有记录。他在本书中所追述的武斗场景，开始觉得好玩，战斗中的紧张害怕，在受伤和面临生命威胁之时，却默默地去尽自己觉

得该尽的责任，一一道来，真是十分的真实可信，十分的令人感动。

唐金鹤所调查的其他清华同学，大都具有同样务实的工作作风。为了核实某一个细微情节，比如，被枪杀时钱萍华穿的是黑裙子还是花裙子，他们曾经认真地争论了好久。为了确定 530 武斗中土坦克出现的时间，他们精确地查到 1968 年 5 月 30 日北京地区的日出时间是 4 点 49 分。为了指明武斗地点和方位，他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出逼真直观的立面地图。这些，都是工程师方式写历史的优势。我记得，有位文革专家读了唐少杰所写《一叶知秋》后，在评论文章中，就曾为作者没有提供清华武斗地图而感到遗憾。

本书对搜集到的史料，经过认真筛选。不肯道听途说，也不肯媚俗随众。在追查卞雨林中箭死亡的原因时，唐金鹤曾专门向我调查：有人告诉她，卞雨林所中的箭上涂有氰化钾，是我们班团派同学郑××带到现场的。她问我知不知道此事。我给她回信说，我过去从没有听说郑××有过此举。在本书中，唐金鹤就舍弃了这个说法。相反，她在追查许恭生之死时说到，在两军对阵中，一位四一四的“勇者”出阵向许恭生单兵挑战。这一情节有点类似小说中古代武士叫阵，太戏剧化，真实性叫人怀疑。部分团派同学对此提出激烈批评，有些参战的四一四同学也不认同，我就是反对者中的一人。但唐金鹤认为，有二十多目击者肯定这一情节，应是事实。在本书中，她坚持采用了这一说法，并将它列为许恭生身亡的原因之一。

或许有人会说，核查落实这些细微琐碎的事实，对研究历史，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认为，任何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由细节组成的。凡是事实，都有核查的价值。任何事情，只要说的是事实，就会寓有历史的意义。举个小例子，本书记述 530 在东大操场双方长矛对阵拼杀的场景时，说到的“冲击波”，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却又不解其义的所谓“战了若干个回合，不分胜负”中的“回合”，这是冷兵器时代自然形成的特定战斗景象。这种实地记录，你说它是细节，其实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此机会弄懂这种细节，对加深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应该说不无价值。

而且，只有研究具体的事实，才能为历史科学构建坚实的基础，也才能为历史评判提供客观的依据。就拿研究 530 大战这段历史来说吧，四十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事件许多问题的看法，团、四两方各执己见，至今没

能统一。但是，如果抛开政治观点和感情的纠葛，专门追寻历史发生过的事实，那么，由于它的真相只有一个，两派同学说话也就有了共同的基础。在本书中，作者将团派武斗指挥官李自茂的文章，与四派几位武斗指挥官的回忆文字，放到了一起进行考察，互相补充印证，使得两方指挥官的回忆能够丝丝入扣，拼接出 530 大战的历史现场真实面貌：这次行动谁是肇起者，谁是策划者；谁在进攻，谁在防守；在什么情况下死了人，在什么情况下放了火。通过这些细节的落实，谁应该为这次武斗负责，谁应该为几位同学的生命负责等问题，也就不辩自明了。

我这里只是说，本书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并没有说，它已经复原了这场武斗的全部真相。虽然作者的本意是要追查事实，但由于个人经历和调查范围的限制，以及记忆的失真等等原因，我们不敢说，她所追查得到的，就已经是事实的全貌了。举个例子，书中讲到 530 大战临结束前，四一四“围魏救赵”，蒋南峰曾带一彪人马去攻打一教。在我的记忆中，在蒋南峰之前，刘万章就曾经从东大操场的队伍中抽出一股，攻打过一教，转了一圈，很快又回到东大操场。可见，即使是四一四中间，要复原全貌，就很不容易。何况，团派同学中像李自茂这样追忆武斗场景的文章，还很少见到。所以，要真正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全貌，还需要更多亲历武斗的清华同学投入其中，并作出努力。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唐金鹤运用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来追查事实，是她的职业习惯所使。但是，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它的功用是处理“事实”。一旦离开处理“事实”的领地，而进入处理“观点”的疆界，比如表达情感、进行政治评判等等地方，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无法运用，他们的职业习惯也就无所适从。在这些地方，唐金鹤往往也会失去了她的冷静和客观。她那充沛的感情，容易冲动的性格，倔强的脾气，就会一一显露无遗。所以，有人也许会认为，唐金鹤在本书中抒发的感想、议论和评断，不少是带有派性和偏见的。毕竟，工程师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何况，经历了像清华武斗这样的血腥对峙的两方，要做到真正的冷静和客观，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 以亲历者的感受复原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

说起文革造反派的形象，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文学演义，大抵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脸谱：凶残，愚昧。参加武斗的人员，那就更是一帮愚忠于毛泽东的亡命之徒了。这种脸谱化的归类，过于简单化，无法解释一批高智商知识分子精英成为造反派、参加武斗的历史事实，也无助于让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在探索前进方向的过程中，走过的种种曲折道路和经受过的种种牺牲和磨难。还原这一代人走过的复杂历程，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现在的历史学家不去做，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去做。

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她是一个亲历者。她在复原清华武斗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复原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有极其丑陋凶残的一面，也有极其悲壮侠义的一面。人性是恶的，人性也是善的。我们需要昭示于后人的是：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会暴露出它的丑恶；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又会展现出它的善良。

“清华园里血斑斑”，本书一开头就掀开历史幕布，展示了一桩桩骇人听闻、惨无人道、人对人进行残酷迫害的事实。其实，这还不仅仅是人对人进行迫害，确切地说，是学生对老师的迫害，是同学对同学的迫害。什么是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什么是恶魔？这就是恶魔。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竟然发生在最高学府，行凶者竟是一些经过全国范围内千挑万选，才选拔出来的“英才”。本书的书名虽然叫做“倒下的英才”，其实它的更多篇幅写的是“杀人放火的英才”，和“丧失了人性的英才”。当然，真正参加打人整人、杀人放火的，只是不多的几个人，但是，这种现象在当时确是普遍可见的，而且在一段时间中，大多数人竟能够容忍这种恶魔行为的公然存在。所以，如果把当时多数的清华学生说成是“中了邪的英才”，确实不能算是冤枉。

本书之所以起名为“倒下的英才”，是因为：作者最先决定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纪念在清华武斗中丧失了生命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作为一个清华武斗中四一四方的救护人员，唐金鹤比其他武斗人员更多、更直接地目睹和经受了鲜血淋漓的生、死、伤、残的惨烈场面。这种记忆，就像利刃刻划在心中，毕生不会忘记。把这份感受写出来，用以祭奠死者的亡灵，这是唐金鹤给自己

设定的责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 530 大战中团派方面死亡的许恭生，又正好是她的同班同学。这使得她追思死亡同学的这份责任，压在心上更加沉重。

许恭生曾是全国高校击剑冠军，在武斗中被对方用长矛刺死，其人其事，影响很大，至今网上有不少文章还在说到他。不久前，我在“清华大学本科招生网”上看到一篇题为《最忆是清华》的文章，写的是作者儿时同韩丁的女儿卡玛结伴在清华园嬉戏的回忆。文中有一段提到了许恭生，读后让我伤感下泪。我特将其摘抄如下：

击剑我们也常玩，主要是受电影《三剑客》的影响。我们很快弄清剑分三种，轻剑、重剑、花式剑。其中轻剑只能刺，不能砍，重剑只能劈砍而不能刺；而花式剑则又能砍又能刺。我最佩服的是当年全国高校的重剑冠军许恭生。他的动作现在想起来，真的和佐罗差不多，既利索又美，而且一气呵成。文革开始后，他加入了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派”。“井冈山”和“四一四”派发生武斗时，许恭生总是担当主力前锋。当时的武斗，因为是冷兵器，所以我们常去观看。两军对垒，个个都身披飞机铝做的盔甲，手挺长矛。但你来我往，并没有什么伤亡。

许恭生确实称得上英才，是当时花季少女心中的偶像。叫人感慨的是，作者笔下的清华武斗场面竟然是“因为是冷兵器，……你来我往，并没有什么伤亡。”她们也许不知道，她们青春时的偶像许恭生就是在“冷兵器”的交战中，被生生刺死的呀！她们也许也不知道，许恭生死后不久，清华武斗很快从“冷兵器”升级到“热兵器”，绝不是“并没有什么伤亡”，实际上，伤亡人数多到了几百人。文章作者当时不是清华学生，她们不了解清华武斗的详情，并不奇怪。奇怪而且令人吃惊的是，清华大学竟然将这篇文章放在本科生招生网上。呜乎，鲜血的教训是这么容易忘却的吗？历史的事实是这么容易湮没的吗？

许恭生是英才，在清华武斗中丧生的其它同学，也都是英才。他们的死，让活着的人扼腕痛心。对他们的死，我反对当时的人们将他们称之为烈士，也



不同意现在的人们把他们说成愚昧的牺牲品。他们不是烈士，但是，他们也没有白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绝不是愚昧的人，他们相信了某种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探求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不幸身亡。无论他们所相信的理想是对是错，他们肯为自己的这种理想去作战，去面对死亡，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行为，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没有，这样的精神不可或缺。我很愿意看到，现在的青年大学生从“中了邪的英才”中清醒过来。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今后的大学生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吸取反面教训，变得“精明”，变得犬儒，一个个都成了“范跑跑”那样的人物。

现在的人们看来，当时清华学生的集体行为确实是太过怪异。20世纪的大学生，身披盔甲，手执长矛，近千人排列开古典战争的阵容，相互搏杀。这不是唐·吉诃德吗？这不是比唐·吉诃德更加可笑吗？须知道，人类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可笑，而是觉得势之所迫，不得不为。到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是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参加武斗人员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后悔当时自己的选择。他们可能会对自己处在那个时代环境而感到可悲，却不会对自己那时的行为感到可笑。

评价人们的行为，不能只看他们做了什么，还要看是在什么情势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据我所知，一些国外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往往习惯于要在意识的表象下找出实际的利益趋动力。清华百日武斗使他们感到困惑：清华武斗的参加者基本是一些学生，在这些同学之间能有什么实际利害，尖锐矛盾，值得他们以死相搏呢？流行的解释是，武斗的实际利益趋动力是部分造反派头头的个人权力欲望。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否则，这场武斗也打不起来。但是实际上，两派头头和广大群众之所以投入武斗，这并不是他们心中更深层的利害掂量。许多群众参加武斗，确实有着自身利益的趋动力，这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为不当反革命而斗争。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中，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可不是说说而已！如果自己这一派真的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话，最后清算起来，许多人可能真的就成了反革命，至少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政治错误可犯不起啊，年纪轻轻，这一辈子可就惨了。清华文革的头头唐伟同学曾经说过：“我们是‘奉

旨造反’，或者叫‘跪着造反’的人，经常想的决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不要成了五七年的右派，不要被打成反革命。而像沈如槐等四一四派同学，坚持武斗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他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真相。

另一方面呢？这些外国研究者产生困惑的原因，部分可能也由于他们太重视实际功利，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对当时中国大学生所起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最显见的当然是毛泽东思想。据我所知，当时清华学生中真诚相信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愿意为这种理想而拼命的人，确实也还是有的。而除了这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思想的影响，常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

清华物理教研组有一位小王老师，由于种种原因，被陷在科学馆里面。他写过一篇文章，平实地记述了他在科学馆中所见所闻。他将留在科学馆里的几位女同学称为“侠女”。读者自己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唐金鹤同学在武斗中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侠女”。唐金鹤在本书中记叙的不少人和事，也都有这种侠、义之风。这“侠”和“义”两个字，是我们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文化革命中并没有消失。它超越“极左或者极右”、“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等等意识形态的纷争。在我们这个民族处于危急患难之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这种品性，势必会展现出来，来应对这种危难局势。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可能认为：留在学校参加武斗的人，一定都是那些团、四两派中派性观点最极端的铁杆分子。事实不是这样，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不是这样。事实是，四一四派内部还分成几派，其中原属天安门纵队的三七战团是它的鸽派。沈如槐的文革回忆录就认为，天安门纵队的领导人是较得人心的“谦谦君子”。他们是一些颇具资格的平民造反派，观点温和，很有文采和口才。他们中的孙怒涛、汲鹏和王良生是被蒯大富列入 530 革委会名单的，但孙怒涛和汲鹏不满蒯大富的极左做法，放弃官位，毅然同蒯大富决裂。本书有很多处提到汲鹏，他是四一四方武斗中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沈如槐在他的著作中还曾指出：清华百日武斗中，四一四方武斗的中坚，特别是各系、各战区级的武斗指挥官，临危受命的，基本是三七战团的“谦谦君子”。像唐

金鹤这样，连温和观点的天安门纵队都没有参加，那就是更加中间的温和派了。他们一向不想武斗，抵制武斗。但是，武斗战火烧起来后，他们留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学校里。而唐金鹤，那是离开了以后，又回来的。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它说明，不能简单地将清华武斗全部看成是两派政治观点之争，它其中的一部分是道义之争。这一部分人参加武斗的主要思想趋动力，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是侠义、仁爱等等传统的中华道德文化。

当然，清华学生不是金庸笔下的侠客。他们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从唐金鹤搜集到的数据可以看到：清华武斗中出生入死、负伤流血的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真才实学，大部分人做到事业有成，他们中有的是博士，有的是教授，还有人在科技领域作出了杰出的社会贡献。在文化革命中特定历史环境中，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精英，参加武斗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应当的选择。

从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出，文化革命中的这场武斗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最丑恶的部分，也召唤出最高尚的部分。简直可以说，这是天使和魔鬼的共舞。但是，看了书中的事例，读者千万别以为四一四就是天使，团派都是魔鬼。事实绝非如此。其实，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凶恶和善良，每个派别组织中都有天使和魔鬼。目前有人已经写文章揭示，四一四派也有非法关押无辜群众的，也有虐待俘虏打人的。最近，团派头头陈继芳同学在谈到反思文革时说，妖魔化对方就是妖魔化自己。她说得不无道理。如果有人借反思文革的名义，有意捏造事实而妖魔化对方，那当然是绝对错误的。汲鹏曾给我说过这样的话：四一四和团派其实是一对双生兄弟，团派犯过所有错误，四一四几乎全都犯过。比如，团派关押了罗征启老师，四一四也关押了陶森老师，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受到的身体摧残和心灵的创伤，那都是一样的呀！对他们，现在我们的心里都是深深的懊悔和内疚。

唐金鹤不是不想公正，只是囿于个人经历，她没有能够看到并写出事件的另外一面。我想，如果团派同学也写出一本回忆清华武斗的著作，他们中必定也会有不少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动人故事。我还认为，即便是那些在武斗中作出错误行为的同学，也绝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们的一些残暴行动，乃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教唆、被诱导出来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本

来也是十分优秀的人才。本书讲到在清华有过一个从活人口中拔牙的残暴事件，对此，汲鹏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个在活口中拔牙的同学，事后受到公众的谴责，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牙科大夫”。汲鹏一次见到他，开玩笑地给他打招呼：“牙科大夫来了。”那知这位同学听到后，很诚恳又不无诙谐地调侃自己说：“我不做牙科大夫了，我现在改行学针灸了。”汲鹏后来了解到，这位同学确实业余学会了针灸，免费为不少人解除了病痛。就是蒯大富本人在武斗中，同样有着善良不忍之心。他在深圳同唐金鹤谈到谢晋澄之死时，我就坐在旁边。我看到他说起这段往事，声音哽咽，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谢晋澄刚死的武斗初期，蒯大富就能将这份善良不忍之心萌发扩大，以此心此理来处理武斗中的团、四两派的矛盾，那末，清华武斗的许多悲剧恐怕也是可以避免的了。

但是，我不想说，在清华武斗中团派和四一四派犯了同样程度的错误，你错我错大家错，没有什么差别。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早在工宣队时期，有关部门就已经查明：最先策划挑起武斗的，是团派一方；发动 530 大战的，是团派一方；几起恶性事故，将人活活毒打致死的，是团派一方；放火焚烧东区浴室和科学馆顶楼的，是团派一方；开枪打死同学的，是团派一方；七二七那天，打死打伤多名来校阻止武斗的工人群众的，还是团派一方。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受到法律惩处和政治处理的人数，团派方确实比四一四方要多得很多。这些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这些不争的事实，却在文革研究专家中间引发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两个学生群众组织的行为差别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真的老四比较善良，恶人都跑到老团那里去了？

对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是组织成员决定论。有些研究人员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两派群众的家庭成分、党团员人数等等一一进行对比，试图从统计百分比中找出答案。他们甚至将某些武斗打死人的现象说成是坏人进行阶级报复。团派同学叶志江在他的《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一文中，谈到团派观点的教师群众组织“红教联”时，说“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在谈到武斗中开枪打死杨树立的赵德胜时，他说：“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

共产党镇压了，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他也相信了“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可见叶志江基本上是倾向于这一种解释的。还有一种解释是政治观点决定论。他们认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本性就是走极端、排除异己，是邪恶的。团派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蛊惑比四一四深，所以在文革中做的坏事也就比四一四更多。本书末尾，唐金鹤引用了四一四头头孙怒涛同学的一封信，他的论述大概就属这种解释。

应该说，这两种解释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团派在武斗中过失较多，其主要原因不在群众，而在头头。同学中分派站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两派群众的人品和能力，基本一样，至少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虽然总体上，团派的造反精神比四一四强，具体到个人，其实，大多数团派同学比四一四的同学更听话，更顺从，甚至更怕事。因为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支持蒯大富的。选择参加团派，这是跟形势，随大流；选择参加四一四，反倒需要一点反潮流精神，多少有点要与中央文革别着劲干的意思。团派头头在武斗中出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准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符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他们吃准了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他们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有恃无恐，头脑发胀，有点肆无忌惮，做事失去了基本的分寸。

沈如槐在看了毛泽东 728 召见的讲话后，在他的书中说：“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 414 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其实呢，不如打个更形象的比喻：在毛主席眼中，蒯大富和四一四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只是蒯大富是亲生的，四一四则是前娘生的，手掌手背的肉不一样疼，偏心肯定是有的。两个儿子都喊娘，争着表示自己最有孝心，其实谁得宠谁不得宠，他们各自心里早就体会得明镜似的。小哥俩一见面就吵，终于打起架来。当娘的喝令几次都息不下来，干脆放话不管你们了，任你们两个小孩子自己打去吧，看你们能闹到什么田地才罢手。两个孩子越打越厉害，娘在一边坐着，说是赌气不管，心里却是巴不得自己的亲生儿早点能够打赢。蒯大富动刀子出狠招，她半闭眼睛看不见。她的全副眼神盯着

四一四，一旦四一四使出什么伤人的打法来，她就会立即变脸，对他实施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态势，蒯大富清楚，四一四头头清楚，在旁边作势劝架的管家谢富治的心里也是清清楚楚。蒯大富有恃无恐，大开杀戒；四一四顾忌重重，缩手缩脚，当然就只能多吃些亏了。四一四头头不是没本事打，也不是生性善良不忍心打，实在是偏心后娘的眼皮下，不敢放开手脚来打。这就叫“不得宠的孩子有眼色”。也幸亏他们有眼色，在这样疯狂险恶的环境下少犯了好些更严重的错误，正如四一四头头蒋南峰在本书中所说的：四一四能够全身而退，简直是一个奇迹。蒯大富呢，他错以为只要靠到一个娘，天底下杀人放火的事都可以干，竟然将家里特地请来拉架的叔叔伯伯都打死打伤一大片，这叫做“宠坏了的孩子惹大祸”。到了这种地步，已是天理不容，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护得住你、救得了你了。

上面我把毛泽东比作偏心的后娘，可能有点失敬。其实，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当然要爱护；对不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也当然要反对。这是很正常的态度。对这一点，他是公开明示了的，并不掩饰。在蒯大富闯下了大祸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说，他站在蒯大富一边，不喜欢那个四一四。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光明磊落的风度。还有，尽管他很不喜欢四一四，至少在大面上，还是给了团、四两派一个平等的测验机会：没有把“制止武斗的工人队伍是他亲自派的”这个信息，单方面通知蒯大富。尽管测验的结果，十分的不如他的心愿，他一再遗憾地责怪蒯大富太蠢，为什么四一四不开枪，偏偏你蒯大富开了枪呢！这真是恨铁不成钢的一片护犊之心呢！现在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埋怨蒯大富在 727 的作为，坏了全国造反派的大事；还有人说，毛泽东没有把派队制止武斗的消息私下通知蒯大富，是故意诱使蒯大富犯错误，是有意要收拾造反派；还有一位团派同学竟然说，727 是毛泽东自导自演，演砸了锅的一场戏，等等。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些说法，对毛泽东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 以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

对清华武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四十年来，中外学术界有好几种不同的评价。同是政治评论家，写《百日武斗》的韩丁和写《一叶知秋》的唐少杰，两个

人的看法，就很不一样。这不仅因为写作年代不同，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究其内里，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标准也是很不一样的。在我们这些老百姓眼里，政治评论这一套东西实在太玄妙，同一件事，你说“好得很”，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他说“糟得很”，也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这里头，怎么没有一个统一的评论基准呢？

唐金鹤不是一个政治评论家。看她所写的文章，不少读者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是一个不怎么过问政治的人。唐金鹤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现在她有两个儿子，四个孙子，是一位典型的老祖母了。古今中外的老祖母，都有老祖母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她们对政治的看法往往是既幼稚，又固执，唠唠叨叨，却常常能把那些伟大政治家呛得一楞一楞的，实在拿她们没办法。她们的价值观说起来很简单：你们那些政治理论一套一套的俺们弄不明白，俺就是一句话，杀人放火的事肯定是错误的！

在美国，民间有个特别的反战组织，叫作“老祖母和平旅”(Granny Peace Brigade)。只有当上祖母的人，才能参加这个组织。一两年前，这些老太太反对小布什政府侵略伊拉克，活动十分活跃。她们或静坐、或示威，还编了许多反战歌曲，一路游行一路唱。更有绝的，她们集体占领征兵站，说是宁愿自己代替她们的孙子去当兵。小布什政府被弄得哭笑不得、恼羞成怒，还真下手抓过她们中的一两个人。这一下，更犯了众怒，连老布什的夫人都不干了，因为她也是老祖母。小布什没奈何，只好赶紧放人。“老祖母和平旅”的政治主张，也是极其简单：那怕你小布什的侵略理论说破天去，反正打仗杀人的事情就是要不得！

唐金鹤对清华武斗的评判标准，同“老祖母和平旅”对伊拉克战争的评判标准，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简明地说出了人类政治最原始的真理。正因为它原始，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用这种老祖母价值观，来复原我们对历史重大事件进行评论的基准，当然也应该用来复原对清华百日武斗，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论的基准。

老祖母的价值观，并不是真的只是老祖母才有的专有品。其实，在人民群众中间，无论男女老少，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为数甚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们

这些当年清华百日武斗的参加者，经过四十年的社会磨练，现在大多数人都都基本认同了“人性为本”的标准。唐金鹤在书中引用了但燊同学的一段话：“人性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国家大政方针的根本。心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善为本。”他的话，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今天我们回顾清华武斗，和反思文革的目的，就是力图尝试运用这种“人性为本”的基准，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们自己的这段历史。

我这里只是说，我们在“尝试”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对清华武斗和文化革命进行历史评论。我并没有说，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用这种基准来评论这段历史了。用“人性为本”基准来评论历史，看起来很简单，而且好像已经是大家的共识。其实远非如此，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这个问题上，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从来不用“人性为本”的基准，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些基准。那是些什么基准呢？他们的基准各式各样，有的是意识形态，有的是政治集团的利益，还有的是本民族的经济利益。他们往往认为，一个历史事件，只要它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那么，做一些违反人性的举动，那就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应该肯定的。有些重大历史事件，杀了几万、几十万人，并不妨碍它们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正面评价。比如在中国，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一些人进行镇压和打击，一向被认为是正确的；在美国，为了推进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动战争，屠杀别国人民，许多政治家认为也是应该的。为了同“人性为本”的历史评价基准相区别，我暂且将他们这些各不相同的基准，起个简化了的名词，叫做“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和话语界，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所用的仍然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而不是什么“人性为本”的基准。

本书“清华园里血斑斑”一章中，一开头举的就是罗征启老师的例子。书中记录了罗征启老师遭到两次残酷的人身迫害的经过，一次在1966年的824事件中，一次在1968年的武斗期间。这两次迫害的手段都是极为残暴，令人发指。对清华文革历史略有了解的人们知道，824的恐怖事件不是蒯大富干的，而是一些拥护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干子弟干的。对罗老师进行第二次迫害的清华武斗，现在的主流史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其施暴的凶手，也已经基本得到惩戒。罗老师对在这次迫害中对他的弟弟之死负有责任的孙



耘同学表示宽恕，受到大家的交口赞扬。但是，对罗老师进行第一次迫害的824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主流的历史学家对它表过态，其组织者和施暴的凶手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其中有的人还官运亨通，身居高位。不要说罗老师没有机会对这个事件的责任者表示宽恕，他们中有人甚至在文革后对罗老师又进行第三次的迫害，他们至今对罗老师却是毫无宽恕之意。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人性为本”的基准来评论，可能认为这样处理既不应该，也不公正。但是主流学界用的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他们就认为很应该，也很公正。因为他们看来，824的红色恐怖是保护刘少奇，政治目的完全正确。既然是你毛泽东提出来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把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小当权派抛出来痛打，这个历史责任就应该算在毛泽东的账上。当时痛打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是政治策略的需要，这样做的人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在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下，他们的理由确实也很充分。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破四旧”、打砸抢，打出人命的，现在春风得意的人，为数还少吗？民愤最大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始作俑者，老百姓想得到他在文革后当了多大官吗？所以说，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复原文革中的历史事实，并不这么简单。要复原文革中的恶性历史事件，顺着主流学界的声势，批批清华百日武斗中的残暴行为，那是远远不够的。

我决不是说，清华百日武斗这样的文革恶性事件不该揭露、不该反思。相反，我深深感到，现在揭露得还太不全面，反思得还太肤浅。不过，我对揭露和反思文革这件事，同主流学界的想法略有不同。他们揭露也好，反思也好，主要目的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我的目的，主要是想从中找出文化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校的清华学生，文革初期我也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我们理解的是正面宣传的理论，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存在许多不公正的现象，确实有一些党内的当权派仗势欺压老百姓；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揭露他们，监督他们，是完全应该的。今天有的同学还记得，我当时曾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生逢时，死无怨。少年立志，赤化乾坤，誓将碧血荐。”但是很快，我失望地看到，那些高呼文革口号的

红卫兵，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做尽人间坏事。我感慨万千地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绕口令似的感言：“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断送文化大革命的”。

我对蒯大富他们这样的平民造反派曾一度抱有好感，对他们某些观点也并不十分排斥。但很快我又发现，他们得势之后，整起人来也是灭绝人性，同以前压迫他们的那些高干子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对文革理论产生怀疑，从消极抵制，逐渐发展到坚决反对。我对团、四两派的极端理论都深感厌倦，长时间中整天沉浸在书籍堆里，试图从马列原著和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寻找答案。在清华武斗中，我这个文弱书生，竟以一个普通士卒的身份，留在学校同蒯大富的团派势力作殊死抗争。530以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留在学校里的人都有一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感觉。我曾向汲鹏提出过一个要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死了，这是我自愿的，只是要求，千万不要在悼词中说我是在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而死的红卫兵或者烈士之类的话。那时，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话。

文革中，我同广大民众一样，对“四人帮”和造反派最痛恨、最反感的，是他们那些丧尽天良的整人手段，也就是说，我们是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反对他们的。在武斗中，眼睁睁地看到身边同学一个个的死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在堂堂中国首都，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王法？这样公然杀人放火的事情，最高领导为什么不出面喝令制止？这种徒呼奈何的愤懑之情，郁结于心，至今未能消散。

“四人帮”对立面的政治力量，开始时也曾发动人民群众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打倒他们。但是，这种政治力量取胜之后，很快收起“人性为本”的基准，在不知不觉中换上了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蒯大富领导的武斗打死这么多人，后来把他判刑关牢的主要罪行并不及此，而是“投靠四人帮，打倒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文革以后，当时群众揭发出来的干部腐败行为的种种事实，统统成了造反派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不实之词，一风吹掉。经过文革的风浪重新掌权的党内当权派，将人民运用民主监督的权利，视为文革余毒，理所当然地给予取缔和打击。正因为这样，现在，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了中国政

界的痼疾。人民群众的不满之声，不绝于耳。

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现实，促使我对文革在经过反思以后，又进行了再次的反思：现在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文革理论，是不是也会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呢？记得文革初起时，美国记者找到当时居住香港的张国焘进行采访。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追求他心中的社会平等。作为毛泽东长年的同志和政敌，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种理解，对我们今天追索文革历史教训，有着特殊的意义。连张国焘都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部分是为了他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平等诉求，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任何理想，如果只有凭借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才能实现的话，这种理想本身也是邪恶而不可取的。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社会平等的理想和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这两者之间，难道就必定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的吗？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对一度掌权的造反派往往抱有成见，认为他们都是些贪污腐化的痞子。事实不完全如此，有些掌了权的造反派，在经济上，与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当权派相比，实在是要清廉得很多。据我所知，即使在清华武斗这样的混乱情势下，负责学生助学金发放的团派人士，一直忠于职守，账目清楚，做到了一钱不沾。掌管团派“井冈山报”收入财务的人员，也真正做到廉洁奉公。工宣队进校后，对他的账目进行审计核查时发现，一份份井冈山报所卖的收入，全然入账无误，所差的几万人民币，乃是经蒯大富批准，用于资助武斗中负伤残疾的同学。最后，在工宣队的监视下，这个团派人士到负伤同学的家里取回这笔差额现款，他流着眼泪却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放在这个困难同学的家里。

我们不能因为文革中追求的某种理想，而原谅、容忍、甚至肯定那些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同样，我也不认为，由于充满了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文革中所提倡的一切东西就必定都是错误的了。难道，为了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所极力反对的党政干部特权、贫富两极分化、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等等社会丑恶现象，就能统统变成合理、合法了吗？

我在再反思中还是坚持认为，文革中那些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毫无疑问，是百分之百完全错误的。正是这些百分之百错误的、灭绝人性的理论和

做法，使文革丧尽了民心，遭到人民的唾弃。而我耽心的是，人民群众这种唾弃，在某些政治利益阶层的导引下，连将文革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那点合理内核，也一并全部唾弃掉了。

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11月初版。

---

【书评与序跋】

## 《倒下的英才》作者序

唐金鹤

《倒下的英才》这本书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上部记录了文化革命中清华园内的点点滴滴；下部则是我自己在清华百日武斗中的亲身经历。这是一本集体的回忆，我只是被大家推到前台的第一执笔者。

这是一段40年前的历史。我们写这本书，是试图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些真实的场景与细节。历史不是靠想象得出来的。没有历史的场景与细节，就没有历史的实感。而没有实感的历史，就只剩下了一些概念与口号。如果只根据这些概念与口号，那就无从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更谈不到反思。

这里记录下来的是清华园里一些人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很多人都向我们表示，不要再提那一段时间，忘记它。他们说：本来已经结疤的伤口，为什么要揭开，让伤口再滴血呢？揭开这些伤疤我们也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只希望告诉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园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未必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但记录下来就是对历史的补充或注释，是对历史和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那些不幸丧生的人们负责。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考虑到多种因素，文中一些人的名字被隐去了，但这不影响文章的真实性。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证本书描述的数据属实。书中所涉及的事件，或由当事人本人执笔；或经过当事人的审阅与认可；或在多个当事人之间，互相印证、互相切磋、去伪存真。

清华园太大了。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每个事件发生的环境与其来龙去脉，文中配合叙述，提供了相关的 1968 年的清华大学校园计算机复原立体图。这些立体图是由建九班（1969 年毕业）的肖春涛学友，根据 1986 年的清华大学平面图修改，绘制而成的。画家温毅明先生为本书作画。

清华的百日武斗已经过去 40 多年了。当年使两派同学慷慨激昂、以致执戈相向的派性情绪早已烟消云散了。现在，经常可以见到当年的两派同学坐在一起，谈古论今；真可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但在本文的叙述中，当年的派性的口号、派性的语言俯拾皆是。清华园里短短的这段历史，就是两派相争的历史。回避当时的派性，删除派性的语言，就无法真实地再现当时的那段历史。在这本书中，我们绝对不想抬高某一派，或贬低某一派。现在我们认为清华的两派，老团和老四，是一对同根的兄弟，他们都是那个疯狂时代的受害者。

有人提出：我们现在回顾历史，就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不带派性、客观地、没有感情色彩地来叙述当时的历史。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们也尽力屏除派性，尽量客观地展现那段历史。但是我们觉得，只有上帝才能够完全做得到这点。上帝高高在上，俯视人间，只有他才能够不偏不倚地评说人间万事百态。而我们是一介凡人，又是亲历者，我们的叙述，难免带有当时的立场、观点，难免流露当时的情绪、感情。我们这样写只是为了再现历史。

《倒下的英才》从初稿到如今，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有一些部分前后改写十几次，不觉间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百日武斗时一个个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在我面前映现。特别是许恭生、朱玉生、孙华栋……这些本来可以成长起来的英才，却一个个无辜地倒下了；他们的影像，在我的脑中越刻越深。别人是在笔尖上沾上了墨水来写字，而我，经常在眼里浸满着悲伤的泪水，在心里流淌着痛苦的鲜血；我是在泪水和血水中，写下了这里的一个个文字。这四年的时间对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多少次我想放弃，我想停笔，不干了。但是我周围的一帮学友，他们总是在激励我，监督我，要我咬紧牙关写下去。我们希望，这段历史不因我们这些亲历者老去而被湮没，也不因我们这些亲历者的沉默而被扭曲。我们的同学陆小宝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的责任”；我们记录下清华文革中的这段历史，是为了思考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教训。

在本书最后的“反思”中，我们谈了一些认识。这些认识太粗浅了，我们抛出来的连砖头都不是，只能叫抛‘泥坯’引玉吧。

为了纪念当年清华园内不幸丧生的人们，我将这本书命名为《倒下的英才》。

愿清华园里那些倒下的英才们安息吧！

2009年仲夏于香港

---

【史林一叶】

## 关于“毛泽东 1965 年春只身到空 34 师”

舒 云

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在回忆录《红色警卫》中，提到 1965 年的 4、5 月间，汪东兴在警卫局党委会上讲了一件事。“前不久毛主席到玉泉山休息，有一天工作了整整一夜都没有睡。翌日拂晓，他还穿着毛巾睡衣，就招呼上警卫和司机，没有通知其他任何人，就他们三人开车出了玉泉山，直奔空军 34 师所在的西郊机场而去。有关人员，如警卫部门、保卫部门都全然不知。”“在空 34 师，他让能到场的人员全部到场，听他讲了一通话，才返回玉泉山。毛主席当时究竟讲了些什么，汪东兴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只字未提”。只是说“毛主席只身突然行动，而我们的警卫人员毫无察觉，这给我们敲了警钟。我们要认真地研究思考一下，如何才能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出现。要确保领袖的安全。”

（《红色警卫》，邬吉成、王凡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 101 页）

1965 年，这是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毛泽东到空 34 师发表怎样的重要讲话？汪东兴为什么只字不提？如果当时保密，至今已经 40 多年了，为什么仍然没有人提起？

现仍住在空 34 师家属院的前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回忆：1965 年春天，毛泽东确实穿着睡衣来过西郊机场。但不是晚上，而是白天——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向黑夜白天颠倒，他夜里是不会穿睡衣的。白天睡醒，毛泽东从玉泉山出来，只带了一个警卫，坐车到了西郊机场火车站。火车站是西郊机场

的内部火车站，在西郊机场西边一、二公里处。因为毛泽东是“突然袭击”，西郊机场火车站只有一、两位值勤战士，毛泽东简单问了问他们的姓名、籍贯。之后毛泽东又坐车到了西郊机场停机坪，看了看飞机，在场的只有少许机务人员。时间很短，毛泽东就走了。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发表重要讲话。

毛泽东到西郊机场，毕竟是件大事，很快传开，整个西郊机场都知道毛主席来了。以后几年，每年这天都成了西郊机场的纪念日。可以肯定，毛泽东没有发表“重要讲话”。如果毛泽东有重要讲话，一定会传达，起码师一级领导应该知道，也肯定会写进空34师的大事记。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回忆：毛主席来时他在地，事后听说了，没有听说毛主席发表讲话。

总之，毛泽东来西郊机场是真的，但是根本就没有发表讲话，只是来转一转，散散心罢了。

---

【史林一叶】

### 关于毛泽东 1965 年春到西郊机场的时间

陈益南

毛泽东于1965年春去北京西郊空34师一事，有人根据并非当事人的邬吉成的间接回忆，将其理解成是在“4、5月间”，甚至推测出是在“4月29日或是第二天的4月30日，或再后的几天里”，这在时间上显然不可能。因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其行踪是：

武汉梅岭一号（3月16日—4月29日）、长沙九所（4月29日—5月21日）、井冈山（5月22日—29日）、吉安（5月29日—30日）、杭州（5月31日—6月16日）、上海（6月16日—27日）、南京（6月27日）、6月28日深夜，专列返回北京。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及南巡之行结束。

---

【蓦然回首】

### 寻人启事

陈虹

“寻人启事”能作文章的题目吗？——有人说没有诗意，有人说肯定要被退稿。但我不想改，我的本意就是为了寻人嘛，我想争取找到那个曾经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全家的好人。

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更不知道。为了便于大家帮我寻找，我必须把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故事详尽道出——

时间应该是在 1968 年的 6 月，具体的日子，则是省级机关发工资的那一天。地点呢，就在江苏省文联的办公室里——不过，那时叫“革命委员会”，门框上赫然挂着的就是这个牌子。

我怕记忆有误，又特别去翻看了一下老爸（注：作家陈白尘）的日记——那是他自从被揪到北京后，坚持在牛棚中写下来的——1968 年 9 月 1 日：“玲来信说，省文联自 4 月起冻结工资，月发 80 元生活费；两个月后改为 100 元。家中生活费用紧张，而玲寄我之钱未减，是颇伤脑筋的。”

不瞒大家说，这就是我能提供出的全部线索了。

当然，话还得从头说起——我爸和我妈原来都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66 年的春天被逐出了京门，发配来到金陵。为什么？凡是过来人都知道，早在 1964 年，一场被人们称作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已经在文化界的内部着着实实地席卷过一番了。夏衍挨批了，田汉被整了，就连我们作协大院中的许多老邻居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卷起铺盖卷返回了老家：赵树理、康濯、周立波、艾芜……我家是最后一个走的，时间为公历 1966 年 1 月 28 日。

那天非常冷，前来南京下关火车站迎候我们的是作家海笑——他当时的身份是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心里不免嘀咕，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待遇好，有暖气，为什么不把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名作家留在全国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偏偏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让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来到南京？”……是啊，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呢？要知道，我妈的命运比我爸还要惨，她只是因为身体衰弱，离京之前竟被强迫办理了“退职”手续——那年她才 48 岁。

然而，更惨的事情还在后面——迁到南京才四个月，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风暴就铺天盖地地刮了起来。这时的老爸在哪儿呢？正在太湖边



上的吴江县“体验生活”呢！一辈子不会写工农兵的他，为了“脱胎换骨”，刚一报到完，就向省文联的领导提出了为“写工农兵”而下去“体验生活”的要求。

接下来，有老爸的日记为证，日子是这样度过来的——

5月10日，省文联以长途电话将他召回南京参加学习。

6月4日，省文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数日内大字报多达500张以上。

6月25日，工作队进驻省文联，负责人高玉书警告我爸说：“你是黑线上的人物，要为子女们想一想！”

7月——8月，写交代材料，共十余份。

8月27日，出现第一张点名质问的大字报：“陈白尘，谁派你来江苏的？你来江苏干什么？”并要求立即将“大黑帮陈白尘”押回北京审查。

9月9日，省文联召开批斗画家亚明的大会，并施以了武斗。会后通知：“全体党员留下。”但我爸被排除在外。

9月10日，小组长滕凤章找我爸谈话，询问对大字报及不让参加组织活动的想法，终以“相信党、相信群众”回答。

9月11日，中国作协造反派来人，将我爸揪回北京。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长达七年之久……

人是被带走了，可我爸的工作关系已经转到了南京，尤其是每月的工资，还得依然由省文联发给。但是我妈不愿去领，她说那个滋味就像是“乞丐”，她怕看到那一双双鄙视的目光，和一张张凶神恶煞的脸。为此，这一任务便当仁不让地落在了我的头上——谁让我是家中的老大呢！于是一到每月发工资那天，我都要亲自跑一趟省文联，先是签字画押，然后再捧回那个装有老爸工资的牛皮纸袋。

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堂堂的江苏省文联怎么会“坐落”在当年国民党的总统府里呢？——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开辟成“旅游景点”，寄寓其内的机关和单位竟也多达数十家。记得省文联是在一进大门的右侧，那是长长的一排厢房，很简陋，也不宽敞，门窗涂成大红色，既“时髦”又俗不可耐；估摸着这几间平房，搁当年最多也不过是给卫兵住的吧？……可能是

因为从小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对于“总统府”三个字，我打心底里没有好感——蒋介石挑起内战的命令是在这里下的，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密件也是从这里送出的……为此，我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于它的全貌，那就压根儿不曾仔细观察过。

其实，我妈当年之所以将这一任务交给我，还有一个原因——我读书的学校就在它的附近。那时叫二女中，现在改称梅园中学。只要腿一迈，骑自行车，三五分钟就能完成这项“重任”，并让全家衣食无虞了。老爸的工资究竟有多少——他虽然拿的不是“文艺级”，算不上“三名三高”，但是按照“行政级”来说，也属于“高干”了。因此直到1968年的4月以前，我们全家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于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每天便忙着“干革命”：红卫兵当不上，就找上几个“志同道合”者，扯起一面旗帜，投奔了南京的“屁派”……

这时远在北京的老爸，日子可是越来越不好过了——“黑帮罪”与“走资派罪”，只能算是小的，因为自从全国掀起“揪叛徒”狂潮后，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大有“永世不得把身翻”的趋势了——谁让他1935年也被关过苏州反省院呢！……于是乎，自1968年的1月起，对他的审查终于升级了——中国作协的原班人马全部撤走，换来的是“中央专案组”的精兵强将！再后来，他们派人来到南京，将我们位于中央路141—2号的家给抄了；再后来，老爸的工资和可怜的一点存款也全都给冻结了……

记得那天，当我妈从我手中接过那个比以往轻了许多的工资袋时，半天没有说话——这个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终于发生了！

八张10元的票子，静静地躺在桌子上，如同带了电，谁也不敢去碰一下。我明白妈妈的难处——这只是老爸原来工资的三分之一；而她自己呢，自从被迫退职后，早已没有了任何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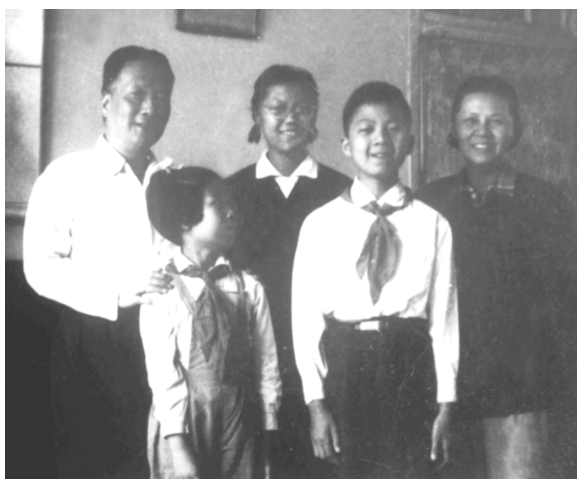
该怎么分配呢？首先必须保证老爸——他一人在北京，除了吃饭、穿衣、抽烟等等开支外，每月还得交6块多钱的党费，不能让他受苦，每月40元的生活费照寄不误；其次是大妈——也就是我爸的大嫂，自从大伯去世以后，老爸胸脯一拍，承担了下来，为此每月10块钱的补贴也必须雷打不动；剩下的呢？只有30元了——妈，我，再加上弟弟和妹妹，他们一个刚上初中，一个还在小

学，全是消费者，挣不来一分钱！……我似乎就是从这一刻起，才突然长大了，我明白了这个家的今后，明白了今后将要面临的一切。

怎么办？总得活下去啊！于是先卖衣服——皮大衣、棉大氅、呢外套、料子服……凡是能够值点钱的，统统用被单一裹，送进了寄卖行；接着再卖家具——书橱、饭桌、沙发、衣柜……除了睡觉的床以外，也几乎被卖了一空。那是什么年代啊？人家不把你当成是被打倒的“有钱阶级”就已万幸了，还敢谈价钱吗？其结果，全都三文不值二文地转了手，为的是换回几张救命的钞票。我记得其中有两个硬木书柜，是当年千里迢迢从北京带到南京来的，白漆的柜面上雕刻着五颜六色的仕女，婀娜多姿，飘飘欲仙。老爸将它们放在客厅当中最显眼的地方，里面摆放着线装版的全套《古本戏剧丛刊》，这是他的命根子，据说全国也只有几十套。但我妈还是咬着牙，让我用板车拖走了，一只才卖了20块钱……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们家要比他家还倒霉——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困顿，尚且不去说它了；就拿亲朋好友来说吧，也几乎没有一个——谁让我爸18岁就离开了老家，而这次搬到南京又仅仅四个月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呢？当时可真叫举目无亲、孤立无援啊，就连借贷都找不到人家！

（右图：陈白尘全家合影于文革前夕）



弟弟那年还不到15岁，他看见有些孩子帮助拖板车的人拉纤，一趟可以挣一毛钱，于是便央求妈妈给他做个铁钩子去为家里挣点收入。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这个营生了——从玄武门到鼓楼，是一个大斜坡，板车拖上去是非常吃力的，于是车老板便会雇些孩子来帮忙：纤绳的一头用铁钩子勾住车帮，另一头背在身上，就可以助他一“肩”之力了。而我们家当年就住在这个斜坡的最底端，等活干的孩子站在马路边，每天都有一大群。

妈妈哭了，我也哭了，弟弟平时在家连衣服都不会洗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我的任务照常是出入寄卖行，弟弟的生活照常是蹲在路边“馋涎欲滴”地看着别的孩子挣钱……我们学会了早早吃晚饭，然后关着灯说话，为的是省下一丁点的电费；我们也学会了缝衣服、补袜子，就连眼镜腿断了，凉鞋带折了，都能自己给焊上。至于老爸的日子，更是令人心酸，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中午在食堂吃饭，只有 0.15 元的白菜，又买了 0.10 的汤，颇感浪费。晚间去对门的小店，二两饭，一碗汤，仅 0.10 元，颇廉。”

……6 月份到了，又该去领老爸的工资了。我同往常一样，走进了总统府的大门，走进了位于右侧的那间挂着“江苏省文联革命委员会”招牌的办公室。让我签字的人是谁，我真的记不住了；他长得什么样，我同样没有一点印象。这能怪我吗？当时只想快快离开，连头都不愿抬。要说印象，似乎只有这样一点点：年龄嘛，大概可以叫他“叔叔”；穿着呢，一身灰布中山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唉，等于没说，这样的装束在当年的中国可举目皆是！

但我向他说的话，却记到如今——那是我头也不抬一口气说出来的，没有丝毫的磕巴：“一个月只给我们 80 块钱的生活费，实在不够用。我家还有一个大妈要养活，而且我自己很快也要下乡了……”这话是真的，二女中已经开始动员了（当时还只是讲的“与工农相结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还没有后来毛泽东提出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的内容），依照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根本不可能留在城里，只能下乡当农民了。但我当时为什么会说出这番话来呢？是乞哀吗？我妈知道了，绝对不会饶过我；是告怜吗？这明明是“与虎谋皮”，怎么会有结果！……但不知怎的，当时我就这样一脱口便说出来了，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不理睬我，那是轻的；如果因此给老爸再戴上一顶帽子，说他“妄图”想要干嘛干嘛，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吗？要知道总统府的大门外贴满了“揪叛徒”的大字报，那上面可是清清楚楚地写着老爸的名字，还打了黑叉呢！

我低着头，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并时刻准备着招来一顿急风暴雨式的批斗。但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屋子里静静的，好像没有其他的人，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到我的耳中：“是这样？……”停了停，他又说道：“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家中还有一个大妈。好吧，再多加 20 块钱吧……”

那天，我像胜利者一样飞快地跑出了总统府的大门，又飞快地跑回了家。100块，整整100块呀！我兴奋地将它们交到了妈妈的手中，我盼望看见她的笑容，看见年幼的弟妹们的笑容……但是，那天我独独没有记住那位给我加钱的人长什么样，也没有问他姓甚名谁。

这20块钱从此就一直发了下去，真是救了我们全家。

依理推测，这位“叔叔”绝非一般的“革命群众”；他有权，起码是“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重要领导，否则又怎么可能在没有和其他人“研究研究”的情况下私自拍板决定，一下子就给“大叛徒”陈白尘多发了20元的生活费？他又为什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呢？这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立场”问题啊，他难道不怕“引火烧身”吗？

想不明白，整整40年过去了，还是想不明白。为此我要写出这篇《寻人启事》——不管他在后来的清查中是不是“三种人”，也不管他是否忏悔过自己的这段“造反”生涯。在我心目中，他永远定格在这一天了：不仅为了那救命的20块钱，更为了在他的身上竟然还残存着那个年代绝对不允许有的“人性”。

拜托了，一切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时间：1968年的6月；地点：江苏省文联办公室；年龄：40岁左右；身份：（也许是）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领导……

---

#### 【博客文选】

按：吴越，本名吴佩珏。男，1932年生，浙江缙云人。1949年投军“二野”，1956年参与创办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农场劳改20年。1979年“改正”，先后任科普出版社编辑、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编审。1992年年底离休。已发表传奇小说、电脑教材等上千万字。

## 我的传奇性婚姻故事

吴越

作者按：8月4日，我的老伴儿故去。我向亲友们发了讣告，同时在网上发了两篇悼念文章，其中提到了我和妻子的婚姻关系颇具传奇性。文字当然写得十分简单。为此，有网上的朋友希望我详细说说我们的婚姻经过和夫妻生活。于是就坐下来边想边写。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 一、二十六年故乡情

1975年，我在劳改农场当“二劳改”，一个月也有32块钱的工资。我花20块在生活上，一个月存5至10元，每年可以存60至80元，四五年下来，也攒了300多块钱了。我决定请假回浙江老家去看看老母亲。

1966年我父亲在文革初期“自绝于人民”，我母亲年老体弱，患有严重的老年白内障，除了二姐每月汇给她10元钱之外，没有其它收入，一个人住在上海根本无法生活，所以父亲死后不久，她就到浙江缙云老家我大姐家住了。

一个月10块钱生活费，住在城市里的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住在农村，不但够用，还有结余。我母亲是上海户口，如今住在农村，每月可以从上海寄来二十四斤全国通用粮票。当时的农村，全国通用粮票是宝贝，出门到外省的人愿意用一斤大米来交换一斤通用粮票。这样，等于买米不用花钱了。菜是姐夫自己种的，可以不算。因此，真正的花费，不过是增加一些油盐酱醋柴而已。其中却以柴为大宗。浙南虽然是山区，但是1958年“大炼钢铁”，把漫山遍野的树木几乎剃了光头，如今木柴卖到七八分钱一斤，比北京城里生火用的劈柴居然贵出好几倍。不过做两个人的饭和做三个人的饭，油盐酱醋柴并不增加太多，因此姐夫并不为此收我母亲柴火钱。

劳改农场对于事假的控制也很严，要是明说回家探亲，根本不可能批准。必须找个理由，哪怕队长明明知道是谎话，他也好对“上面”有个交代。因此，我写信请姐夫给我发了一封“母病危速归”的假电报，请准了事假，动身上路了。

我大姐子女众多，自己养不过来，有一个女儿，送给表兄领养。这个表兄就住在金华汽车站旁边。中共建国以前，他本来是自己开小旅馆的，建国后先搞“联社”，后来与国营旅馆合并，如今两口子 and 领养的女儿都在国营旅馆工作。我到金华下了火车就直接上了表兄家。

在表兄家里，我碰见了表嫂的一个表弟徐子豪，缙云县新建区黄碧村人，已在江西铅山县落户，这次是回来探亲的。他听说我在北京工作，就跟我攀谈起来，谈得还挺投机。

聊了一会儿，他见我身上穿的灰涤卡上衣和一条假哗叽裤子料子似乎还不错，就问我像这样的料子北京好买不好买。我说很好买，但是都要“工业品购买券”。他问一套衣服要多少工业券，我说大约两张半。他问我一个月发多少张工业券，我说每月一张。他听了，就不说话了。我知道他很想买，就告诉他：如果他需要，我可以帮他买，只要把钱给我就可以，工业券由我出。因为我不大买衣服，几年来攒的工业券不少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再说，如果他买的数量颇大，工业券是可以用钱买到的，价格也不贵。他听了，当时就给了我两套料子的钱，给我写了地址，要我回北京以后帮他买，然后寄到江西去。

没想到，这个偶然认识的、八竿子扎不着的亲戚却引发了我天外飞来的婚姻。

## 二、姐夫劝我落叶归根

我二十六年没见大姐和大姐夫，跟母亲也整整十年没见面，她们都苍老了。特别是母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一见到游子回到膝下，抱住了我的脑袋放声痛哭，诉起离情别绪来，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姐夫所在的那个村是个大村子，名叫雅化路村。但是村里的人，包括姐夫的几个孩子在内，我都不认识。他们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只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对我都很客气。那时候我正在写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而这部小说的地理背景，正是以雅化路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的各个村镇，包括缙云第一大镇壶镇在内。为此，我除了一早一晚与母亲聚谈之外，其余时间，都在这些村子之间奔走，目的是搜集一些当地的民间传说，以充实小说的内容。

姐夫和我大姐一样，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老了却生活无着，要靠自己种田、养猪、养长毛兔过日子，晚景凄凉，对于世事纷争，已经淡漠得很。关于我的前途，他的看法很简单也很明确：中国人多得很，人才也多得很，毛泽东只相信工人和贫下中农，从来不信任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

范畴的知识分子尚且不用呢，何况我已经成了右派。因此，不管我怎样努力改造，一切全都是白费。今后，我只能作为一个劳动力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他叫我都不要去干，干了也不讨好，甚至还要遭灾惹祸。他以我父亲为例，劝我不要再写什么文章了。写文章不但写不出美妙的前途来，很有可能会毁了自己。从我下半辈子的生活安定出发，他要我认命，安心地从事体力劳动。但不是在劳改农场，而是在故乡农村。他的主意是：先在农村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了婚，然后向农场申请回家务农，做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农民，了此一生。

他的看法，与我父亲的看法完全不同。我父亲生前的意见是：打死也不回缙云，只要活得下去，宁可在北京捡垃圾，也不到缙云来种田。他的理由是：缙云山高，所以缙云人眼光短浅。如果我从小就生活在缙云，倒也罢了，如果人到中年，又是一事无成、一败涂地之后回来，不但被人看不起，还会成为众矢之的。就好像一条一尺长的鱼，在大江大河大海中，显不出来，如果一旦投进小河沟、小池塘里，可就成了大鱼，要被人人所注目了。

但是架不住姐夫天天给我念这本经，就是我心里不愿意，口头上也得说声同意，以表示尊重他的意见。姐夫见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就四处托人打听做媒，条件是：女方有家有业，是寡妇还是离婚都无所谓，年龄大小点儿也无所谓，是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家庭也无所谓。

不久，媒人们就一个个找上门来，要我去相亲——也就是送上门让人家相了。

第一个是个离婚回来的姑娘，年纪只有二十多一点儿，长得细皮嫩肉的，脸蛋儿还挺白，打扮得也挺朴素淡雅，读过两年初中。离婚的原因媒人也不瞒着：是因为她跟村里的干部有些不清不白，被丈夫知道了，反正还没孩子，就分手了。可那个村干部是有老婆的，没法儿娶她。此事当地人几乎都知道，因此虽然想嫁人却也不大好嫁，最好的出路是嫁到外地去。所以听说有个北京回来的缙云人想在本地找对象，她就同意先见见。姑娘见了我，倒是很客气，也挺能说，一个劲儿地说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笑嘻嘻地沏了糖茶双手捧过来给我喝——这在缙云可是接待“上客”的礼节，一般不是正月里拜年，是不会用糖茶待客的。



见面之后，姐夫问我印象如何，我说年纪比我小一半儿，未免太小了点儿，怕不肯跟我。姐夫请媒人去问女方的态度，媒人回来说：女方倒不嫌男方年纪大，听说男方有学问，也愿意跟随男方到北京去，但不知道男方一个月挣多少钱，能不能养活她。媒人说我一个月挣 50 多元，女方说太少了，没法儿过日子，说是还要再考虑考虑。50 多块钱还嫌少，要说 32 块呢，还不把她给吓一跳？

这个是女方对男方的收入不满意，没谈成。何况姐夫是要我在缙云当“上门女婿”的，不是把老婆带到北京去。

第二个是民办小学教师，三十多岁了，没结过婚，尽管每月工资只有 24 元，却给自己做了一箱子嫁妆，还买了一辆挺新的男式自行车。看起来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姑娘。她家里是富农成份。不过这并不是她嫁不出去的原因，至今未婚的关键性原因，是她右额角一直到眼睛部位有一块很大又很红的胎记，平时都用头发遮着，但也遮不全。女方家里有哥哥和弟弟，因此不可能招婿，只能在女方的学校里安家。

我到她的学校里去看了，一个小小的山村，村外有一座祠堂，这就是学校，她既是老师，也是校长，还是工友，一间教室里共有五十多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都在这里了，当然所有的课程都由她一个人教。应该说，这样的本事，我还没有。见面的那一天，她听说我从前是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很虚心地请教我汉语拼音中 in 和 ing，en 和 eng 怎么区分，对我的谈吐和水平还是挺佩服的。

但是我发现她的脸上不仅仅额头上有一大块红色胎记，脸上还散布着许多小红点，只好婉言谢绝了。

第三个是个烈士的遗孀，家里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十三岁，小的才四岁。她丈夫是个工人，共产党员。一次在溪边发现有人溺水，他下水去救，结果救起了别人，他自己却溺死了。他被认定为烈士，发了抚恤金，三个孩子每人每月发八元救济金，一直到十八岁为止。如今她自己在壶镇十字街头摆摊儿卖甘蔗、荸荠，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媒人带我到壶镇街上她的摊位前直接与她见了面。这是个小小个子女人，三十五六岁，头发梳得光光的，围着雪白的围裙，一副干净利落的样子。她见我穿着呢子大衣，皮鞋贼亮，还戴着眼镜儿，不知道

我是个多大的干部，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一开口就说：“你在北京当官……”媒人是她那个村的村干部，立刻纠正她：“不是当官，是当干部。”她接着说：“我们是乡下人，没读过书。不过我会洗衣服做饭，可以伺候你。”媒人又纠正她：“不是你伺候他，是互敬互爱，共同帮助。”她接着说：“我一听说上北京，心里是很愿意的。可我的三个孩子都还太小。能不能再等我两年，只要大孩子能自己做饭，能照顾两个小的，我就跟你走。”说着眼眶里涌出了泪水。

面对这样纯朴的女人，我只好说：“你的孩子还太小，离不开母亲，过两年再说吧。”我感到自己像一个骗子在欺骗她，清河农场有许多二劳改家属就是以“上北京”为钓饵骗到手的。我真不忍心告诉她我是个“二劳改”，不是什么官儿。她也不想想，如果我是个官儿，怎么会回缙云来娶她？

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她对我的话没什么反应，却蹲下身子去，摸了摸我的皮鞋，惊讶地问：“这鞋，得一百多块钱一双吧？”

她说的还真靠谱儿。我的这双鞋，是1953年在上海买的英国产最高级的宽边硬底皮鞋，是专为进舞场买的。当时的价格只要50多块，将近我一个月的工资了，这还是处理从前的存货，打了对折的。我穿着这双鞋进的劳动教养收容所，天冷以后队长发给我一双劳改棉鞋，才把它换了下来，从此一直保存着没穿。这次回浙江，实在没鞋可穿，这才把它穿出来了。

一连见了三个女人，我姐夫也懂得了：像我这样的条件在缙云找个老婆有多难，就不再张罗着给我找媳妇儿了。

### 三、少年时代的知交

我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回到故乡的，那年我刚六岁。我在缙云县从小学二年级读到初中二年级，抗战胜利后，才在1946年离开缙云，跟随当“法官”的父亲到瑞安、嘉兴、杭州、金华、丽水这些地方转，直到1949年6月在金华参军去了四川。在缙云县的八年时间中，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但是三十多年过去，有的连名字都忘记了，有的也和我一样，远走他乡，不知道流落何处。闲谈中，大姐告诉我：我从小学到中学最好的同班同学何同仁，20世纪50年代在杭州中医学院毕业以后，参加一个医疗队到新建区一个梅毒猖獗的村子根治性

病，后来一直在缙云当医生。几年前我大姐在县里碰到他，他还打听我的下落呢。

经她这样一提醒，我怀念起我这个最好的少年朋友来了。上小学的时候，我和他同班又同坐一张课桌。每天上学，不是他到我家来约我，就是我到他家去约他，连课间上厕所都要一起去。他家以前在县前街开春寿堂中药店，那是他家的祖产，即便现在中药店不开了，只要那房子还在，总能够打听到他的下落的。从壶镇到县城有直达公共汽车，六十里路，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不过没坐公共汽车，而是借用我外甥的自行车——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从壶镇到缙云的公共汽车每天只有两班，车票难买，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省钱。

到县前街一看，春寿堂药店果然没有了，原址开的是一家杂货店。进店一问，才知道何同仁一家依旧住在后面，不过现在开的这店不是他家的，所以前后隔开，他家另从后门进出，我转到后门去一问，更巧，他正好在家里。

多年不见，当年小巧玲珑的何同仁已经发福，胖胖的身子，红红的脸蛋儿，前额的头发已经掉了不少，变成当年他父亲的模样了。不过那脸型基本上没变，我是点名找的他，所以他一出来我就能够认识，而他根本就想不到我这个三十年不见的不速之客会登门拜访，何况我的样子已经大变，等到我自报姓名，这可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欢愉之情，溢于言表，立刻把我让进他的房间里去。

来找他之前，我就打定了主意，在老朋友面前，什么也不用藏着掖着，是怎么回事儿，就说怎么回事儿。他在离新建镇只有三里路的河阳公社卫生院。河阳是个大村子，缙云民谣中唱：“有女嫁河阳，好像做娘娘，住的白粉墙，穿的新衣裳。”可见居民的富庶，如今又是公社所在地，所以卫生院的规模不小，占一所大房子，有好几个医生。上个星期天他值班，所以昨天、今天轮到他休息，下午就要回卫生院的。我暗暗庆幸自己的运气不错。

我问他参加文革的情况，他说他是“革命派”的小头头儿，参加了区里的夺权斗争，每次区里开大会，他都要上主席台的。我犹豫了一下，虽然他是“革命派”，关于我自己的身份，仍决定以实相告，绝不隐瞒，如果他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面目出现，我站起来就走。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态度非常

明朗：“不管你是什么派，咱们是老同学，今天相见，咱们只叙旧情，不谈政治。”不过我还是劝了他两句：像他这样正牌儿大学毕业的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到处受人欢迎，最好不要参加说不清楚、扯不明白的政治斗争，以免像我这样卷进政治漩涡中去无法自拔。他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但是已经骑虎难下，只能慢慢地相机撤身了。

谈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已经中午。在他家吃了午饭，接着谈起了我的处境。他劝我说：既然都是种田，与其在举目无亲的北京种，在劳改队长们监督之下种，不如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来种，不但亲戚朋友多，有个照应，将来年纪大了，也有个归宿，不在他乡外地当孤坟野鬼。我叹了一口气，告诉他：我因为家在三大城市，政策规定不许离开农场，除非我先在缙云娶个媳妇儿，先制造一个家，要不然，看样子只能一辈子在劳改农场当“二劳改”了。接着谈起了我姐夫给我张罗的三个女人的故事。他沉思了一下，说：如果我真愿意在缙云安家，他一定帮我物色一个对象，当然条件不能太高。我有文化又有种葡萄的技术，生活苦一些的村子，地主、富农的女儿等等，还是有人愿意嫁我的。不过女方最好有点儿文化，不然感情上无法融洽。我谢了他。他说这种事情可遇而不可求，他随时注意就是。

又聊了一会儿，他要动身回河阳去了。他盛情邀请我到他的卫生院去看看，好在路不远，三十几里路，骑车一个多小时就到。我反正闲着没事儿，就答应了。

#### 四、从天而降的媒人

我们一人一辆自行车，出了北门，刚蹬了十几里路，迎面碰见了徐子豪。他也骑着自行车，见了我，喊了我一声，立刻跳下车来，高兴地说：“真巧，我正要去找你呢！”

我也跳下车来，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我姐一定要见见你，逼着我立刻骑车上壶镇去找。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要不，我赶到壶镇，还是找不到你，岂不是两头错包了？”

“你姐为什么要见我呢？她是干什么的？”

“她是个小学教师。不为什么，就为我回家说起托你买灰涤卡和混纺哔叽

的事儿，我姐说：我和你根本就不认识，第一次见面，就肯帮忙，还要你贴工业券，这可是将近半年的工业券呢，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所以一定要见见你。”

“可我现在是跟我这个老同学到河阳去的，我们三十年没见，想多聊聊呢！”

“那不行，你得先跟我走。你先见了我姐，再到河阳去，还不行么？好在并不绕多远，最多多走五六里路，骑自行车，不过十几分钟的事情。怎么样？”

我还在犹豫，何同仁说话了：“人家都要上壶镇去找你了，那可是来回一百八十里路呢！没要紧事儿，谁愿意走这一趟？就冲他这股子热情，你也得去见见。我先回去，回头你直接到河阳来找我。到那里打听卫生院，没人不知道的。”

我只好笑着跟老朋友道别，骑上车跟新朋友走。不过半个多小时，过了黄碧街，就到了黄碧村。这是一个离公路约三里的大村子，当年袁枚就曾经造访过，并写下了著名的《仙都游记》。村小学设在一所挺大的祠堂内，墙壁刷得雪白，倒挺干净。子豪把我带到他姐姐的房间里，见姐姐不在，让我先坐着，他出去到办公室寻找。一会儿回来说：他姐姐正在上课。子豪就给我沏茶，陪我聊天儿，问我跟何医师的关系之类。他长年住在江西铅山县，尽管何医师当年在黄碧街一带很出名，可他却不认识。

没过多久，他姐姐就下课进屋来了。她叫徐子玲，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小鼻子小脸小嘴巴，不过眼睛却挺大的，脸色红润，显得很精神也很干净利落。她嘻嘻地笑着，跟我解释她很想见我的原因，是听他弟弟说起我的为人、见识，很佩服我，再说，我是她表姐的表弟，拐个弯儿也算亲戚，应该认识一下，赶明儿她到了北京，也好找我帮助办事儿。刚说着，她上课的时候就已经请同事帮她做的点心做好了，由那个同事端了进来，是炒米粉干加两个荷包蛋，我和子豪一个人一大碗。这是缙云的风俗，第一次进门的客人，请人家吃面条加鸡蛋或米粉干加鸡蛋，是最客气的招待。我也只能入境随俗，说两句道谢的客气话，坐下来就吃。其实刚吃过午饭不久，肚子根本就不饿。

吃过了点心，子玲又沏上茶来，接着聊。她介绍她自己：她是缙云新建中

学高中毕业生，今年三十五岁，已经当了十几年小学教师了。丈夫叫雷一声，是畲族人，如今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有个十一岁的儿子，跟她一起住。她问我做什么工作，北京都有什么人，缙云老家还有什么人。我以实相告：原先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3年摘帽，如今在北京团河农场种葡萄。同时告诉她：我的老同学何同仁医师正劝我在老家找个对象，然后申请把户口迁回缙云来，图一个落叶归根。

她听我这样说，立刻接了下茬儿：她有一个同班同学，叫楼兴娟，高中毕业，现在在食品公司新建食品站当收款员，家就在新建镇镇内，今年三十四岁了，因为高不成低不就，至今还没有结过婚。她的同班女同学，大都已经做了母亲，只有她是惟一的一个大姑娘了。从女方的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长相模样、居住地点等因素考虑，与我都很般配。何况她的父亲是生产队会计，两个妹夫一个是村长、一个是村支书，在村子里都是实力派。如果我打算在缙云找对象，这是“最佳选择”，她可以负责给我介绍。

我没有想到子豪巴巴儿地把我请到他姐姐这里来，原来是要给我介绍对象。看起来，她一定要让子豪把我叫到她这里来让她见见，就有了给我介绍对象的心思，对我的“第一眼”似乎也还满意，对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的政治身份也不太计较。听她介绍的这个女方，条件比我见过的那三个都好。于是我表示感谢，并说今天晚上我计划住在河阳卫生院，那里离新建镇只有三里路，最好明天能够约一个时间，我到新建镇去与女方见一面。不料子玲却说：“何必等到明天呢，从我这里到新建镇，也不过十二三里路，骑自行车去，有半个小时就到了，现在时间还早，反正下午我也没课了，咱们说走就走吧。”

我更没有想到她办事这样痛快，当然只能一切都听她的。到了新建镇上，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左右。这时候跑到人家家里去，岂不是赶饭去吗？子玲是个很仔细的人，她建议先到饭店吃饱了肚子然后再去。于是一行三人来到新建镇街上惟一的一家饭馆。一问，主食只有米饭，交粮票，三毛钱一斤；菜只有一种：青菜豆腐，两毛钱一碗。当时的政策，还不许私人开饭店，这家饭店是大队办的，算是“社办企业”，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方便到镇上来赶集或办事的各村农民和“革命群众”，因此主要供应中午饭，晚饭只好剩下什么卖什么了。要了一斤米饭、三碗青菜豆腐，一共还不到一块钱。我和子豪都

是刚刚吃过米粉干的，肚子还饱得很，子玲的饭量不大，加上那种米叫做什么“杂交稻”，也许产量比较高，吃起来味同嚼蜡，所以叫的饭菜只吃了一点点儿。

吃过晚饭，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到她上班的地方一打听，说是楼兴娟刚吃过晚饭，回她自己的宿舍去了，在镇西头的火腿厂内。火腿厂与肉店同属一个单位。我们找到了火腿厂。进门之前，子玲嘱咐我一切按她的口气和眼色行事，不该说的话，尽量不要说，更不要一开口就说自己是右派。

进门之后，我发现这是火腿仓库的一间小外屋，在这里睡觉，实际上等于值夜班守仓库。不过真正值班的是一个永康籍的老头儿，是个腌火腿的老师傅，住在她房间对面。

房间只有六七个平方米，床上铺着粗线毯，连床单也没有，床边的绳子上搭着衣服、毛巾、袜子，桌上放满了杂物。整个房间突出了两个字：穷、乱。房间里已经有两个男性客人在聊天，据介绍都是食品站的工人。子玲进门以后，就说：她弟弟从江西回来了，在金华认识了一个在北京工作的缙云人，今天她们姐弟俩到新建镇来办点儿事情，顺便送这个朋友到河阳看望他的老同学何医师，如今事情办完了，先一起来看看老同学，然后再上河阳。她这样说，倒是避免了介绍对象的那种拘束感，彼此的说话可就方便多了。

室内原来在聊天的人听说我是北京来的，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这里来，要我讲讲北京的近况——当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动态。这是我最近几天来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倒是不用准备，张嘴就能说上一大套。说着说着，子玲故意把话题引向文革初期在新建的大武斗，从大武斗又谈起了楼兴娟所遭受到的迫害，你一言我一语的，谈得倒挺热闹。综合大家的话，可以得知楼兴娟当年的大概经历是这样：

她 1961 年高中毕业以后，因为舅舅是地主，按当时“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策，规定与地主有亲戚关系的人不许考大学，先在信用社干了两年，1963 年以后就一直在新建区粮食管理所门市部当营业员，管现金收付。文革初期，缙云县的革命派分为“红联总”和“革联总”两派，两派都标榜自己最忠于毛主席，是路线最正确的革命派，双方观点不一致，讲理讲不通，最后只好动武，而且打得相当激烈。兴娟是管现金和粮票收付的，一打起来，不管是

“红联总”还是“革联总”，都有可能来抢门市部的现金和粮票。如果现金和粮票在她手上丢失，不管是哪一派抢走，责任都在她这里。所以她一见两派要动手，现金解送银行已经来不及，只好不管别的，立刻把所有现金和粮票都装进一只手提袋，悄悄儿拿到自己家里的房梁上藏了起来。等到武斗结束，把现金和粮票一张不少地拿回粮管所。但是这次武斗，最后是“革联总”取得胜利，粮管所的大权，落到了“革”字派的手中，而她恰恰是属于“红”字派的，



于是本来应该是“保护现金粮票有功”的人，在对立派掌权之后，却愣给她揷上了一个“非法转移现金”的罪名，结果有功反而变成有罪了。单是这一件事情，还无法处理她，因为现金没少一分，粮票没少一两。恰巧有一天下班之后大家都集合在一起做“晚汇报”仪式，而她却在井台上洗衣服，没有参加——那年月，全国人民几乎每天都要做“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也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像前面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她对这种仪式从心底里极反感，所以能逃就逃，以前也不知逃避过多少次了，也无所谓；这回让对立派抓住，借此题目做了文章，打她一个“对毛主席不忠”，以“下放农村劳动”的名义打发她回家了。

她不服，先到县里告，没结果，后到地区告，也不理她，最后干脆约了两个也是受迫害的人一起上北京告，像叫花子似的坐慢车、睡车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站接见了她，拿回来一张印有大印的公文，要地区“认真处理”。地委书记接到这张公文的时候两手都嗦嗦发抖，但是看到具体内容不过是要地区“认真处理”，可就不认真了。她回来以后生了一场大病，吃了好几十服药，身体没恢复，冤案也没平反，却花了 500 多块钱，掉了二十多斤肉。

好在她的父亲是生产队会计，她从父亲那里学来一手过硬的打算盘本事，她的“铁算盘”在全县都闻名，什么复杂的账目，一般只要打一遍，基本上不



会错。后来总算到新建食品站肉店当收款员，当然是临时工，一个月挣 27 块钱。

一个收款员，干一天还不到一块钱？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再一问，在缙云县，一个月 27 元的工资并不是最低的，多数民办小学教师的工资，只有 24 元。在北京，就是劳改农场等外二级的“二劳改”，一个月也还有 25 块钱工资呢！看起来，劳改队的工资，居然比地方上有些人的工资还要高一些。

她的那两个同事，都是屠宰工人，其中一个还是复员军人，但是对文化大革命都持不满和否定态度。有这样的共同基础，所以谈话倒是挺融洽的。我们只顾说文革中的怪事儿了，还没怎么提起我的情况，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我怕何同仁久等，告辞要走。他们告诉我：从火腿厂到河阳，只有两里路。又怕我黑夜里找不到卫生院，她的一个同事愿意主动送我去。

子玲送我到火腿厂大门口，悄悄儿问我对娟的印象如何。我说印象不错。她说：那么明天就问问她对你的印象如何，如果也还可以，你们就先通通信吧。

我到了河阳卫生院，同仁都等急了，我告诉他有人要给我介绍对象，并说了见面的经过。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是这个楼兴娟，在缙云出名得很，他也认识的。如果能够成功，当然更好，如果不成，他再另给我介绍。

## 五、利用诗歌和小说求婚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感慨万千，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首长诗，题目就叫《仙都探亲行》(1985 年缙云县文联成立，聘请我为名誉主席；1986 年由缙云县文联编辑出版的内部文学刊物《仙都》第一期上全文发表)。

我回到农场，立刻给娟写了一封长信，首先亮明自己的身份，然后简单介绍自己的历史，并对她的处境表示同情。结尾是相信人类必然走向进步，一切落后的、封建的、迷信的东西都将被历史所淘汰，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只能在历史面前做出牺牲了。信中附上了我所写的这首长诗，同时嘱咐她看过以后，必须烧掉——我这是“投石问路”，如果她看了信和诗对我表示同情，这个朋友就有可能继续交下去；如果没有共同语言，那么这第一封信，也就是最后一

封信了。

不久她的回信到来，第一句话就说：根据那天晚上我所说的话，她就已经意识到我是个犯了思想性错误下放到农场去的人，估计我不是右派分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没想到我居然严重到进了劳改队。不过她立刻表示并不因为我身在劳改队而对我有所歧视。根据她自己的亲身体会，她十分明白：进监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而盘踞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则不一定是好人。她既然已经被下放到社会的最底层，早已经一无所有，所以她也不怕再丢失什么，更不怕有我这样一个身在劳改队的朋友。她还说：也曾经有许多人给她介绍对象，第一次见面或者第一次通信，这些人总是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还没有一个人肯把自己的不良处境先和盘托出的。因此，她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儿与众不同。特别是看了我写的那首诗，她很受感动，也从诗中了解到我的心态和志向，如果不是我再三嘱咐看后必须烧掉，她真想把它保存起来。诗虽然烧掉了，但她对我的认识更加明确了。她说：只可惜她的水平太低，不然，她一定要帮助我完成我的事业。

从来信中可以看出，她对我的第一印象还是好的。既然她明确表示对我同情，话也说清楚了，以后的通信那就方便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双方都没有任何顾忌。从她的来信中得知：她有一个哥哥、四个妹妹，哥哥是个复员军人，现在合肥锻压机床厂当党委办公室主任；两个妹夫，一个是大队长，一个是大队支书。加上她父亲是生产队会计，如果我真要回到缙云去务农，有这样一家人家作“保护伞”，跟她一家人把关系搞好了，至少可以少受些苦。

那时候，我的《括苍山恩仇记》已经写完了第一卷即前两册。在我们通了若干封信以后，我就把稿子抄了一份儿寄给她，告诉她这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事业。不管受到任何挫折，我一定要把这部稿子写完。第一，请她看看，是否值得继续写下去；第二，如果她愿意，请她代我保管好稿子，一旦条件成熟，就拿出来出版；如果条件不成熟，哪怕像《红楼梦》那样，即便作者死后三十年再出版，也在所不计。反正我写书，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求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留给后人。

不久她回信说：她用最快的速度夜以继日地看完了八大厚册稿子，认定稿子写得很好，值得继续写下去。她还把稿子拿给几个信得过的老先生看过，他

们异口同声都说写得不错，有人甚至说这样水平的人，在缙云找不出第二个来了。所以她答应一定尽她所能替我把稿子保管好。不过她也很明确地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不结束，她是绝不结婚的，所以她只能以好朋友的身份替我保管，然后共同等待时机的成熟。

## 六、时机成熟了么？

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我以半分钟之差万幸没被砸死，并被管生产的焦队长分配到远离中队一里路之外的一个水泵房中值班，负责浇灌二十多亩地的大白菜。焦队长脾气暴躁，外号“焦大炮”，但对我却爱护有加，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据说他是打游击出身的“红小鬼”，上个世纪50年代，他原来是中南海的一个机要通讯员，往来于毛刘周朱之间递送重要文件，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夫人在传达室工作。有一次两口子吵架，脾气暴躁的焦大炮拔枪就打，把他夫人的一条腿打伤了。为此受到处分，被送到劳改农场来“教育别人，提高自己”。据说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卫人员除上岗外不许带枪，与他的那次闯祸有直接关系。

10月上旬的一天深夜，毛泽东死了还不到一个月，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写作，忽然听见房门上有急促的剥啄之声。我这里是远离居民区的单门独户，一天到晚连个鬼都不会来，我咋起胆子来问：“谁？”

“快开门，是我！”是中队宣传员赵植林。

这个赵植林，是20世纪50年代派到苏联去留学的学生，是毛泽东所说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1957年正在莫斯科大学学新闻，没有摊上右派，回国以后分配在交通部工作，“庐山会议”以后却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抓了起来，没有经过劳动教养，就送到劳改农场“强制就业”来了。此人能歌善舞，能写会算(出国前是安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所以被任命为中队宣传员，同时协助中队统计员工作，在中队里也算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红人。1974年，我的《括苍山恩仇记》逐渐构思成熟，开始命笔。由于我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因此不能坐在宿舍里写。那时候我负责八十亩稻田的放水，每天出工，地里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做好水平畦口，让田水自动流入，然后每丘田巡视一遍，没什么问题了，就坐在田埂上用我那一笔独创的狂草低头疾书。

有一天，我正在写“师兄弟校场比武”那一章，全神贯注中，竟没注意身后有人走来。一声：“写什么哪？这样认真！”回头一看，原来是赵植林巡查来了，吓得我毛骨悚然。如果他发现我在写小说，汇报上去，那是绝对说不清楚的，弄得不好，批斗之外，还要吃不了兜着走。我破釜沉舟，豁出去了，干脆直说我在写一部以清末农民起义为主题的历史小说。他立刻表示颇感兴趣，我也就给他朗诵了一段。没想到他对我的小说居然称赞不已，不但不批评我，反而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从此他成了少数知道并支持我写小说的人之一。我来水泵房之前，每逢星期假日，他总是把我倒锁在放宣传用品的仓库里让我清静地写小说，而且我写一章他看一章，以他“莫大新闻系”毕业的高造诣指导我写作。

我赶紧开门。只见老赵上身裹着棉大衣，下身只穿一条秋裤，看样子是刚从被窝里爬起匆忙赶来的。他像一阵风似的卷了进来，也不在炕上坐下，而是站在那里迫不及待地说：“有好消息！刚才我听莫斯科俄语广播，江青一伙儿被抓起来了。”我还有些不大相信。他接着说：“我天天看报纸，正奇怪这几天怎么没有江青他们的消息了呢，没想到毛泽东死了没几天，这么快他们就倒台了。”

据他分析，江青一伙儿是代表中国极左思潮的，他们一垮台，政治形势必然会有所放松，我写的小说，很可能有机会出版了。因此他连夜赶来通知我这个好消息。

他走了以后，我立即给娟写信，告诉她天气阴转多云，马上就要放晴了。尽管我的政治问题一时半会儿的解决不了，但我的稿子可能会有出路，她也可能有了出头的日子。

“四人帮”的倒台，是我的小说能够出版的前提，也是我和娟能够商谈婚事的基础。我们都认为，只要“四人帮”一倒台，不但她的冤案问题有可能解决，有可能考虑婚姻问题，连我的政治问题也有可能解决，至少可以放松，例如不再把“摘帽右派”列为专政对象，恢复真正的公民身份并适当安置工作等等。而我则认为：只要允许我出版小说，我的命运和前途必然也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开始商谈婚事了。我提出了极为苛刻的结婚条件。

我写信告诉娟：第一，我是因为直言而获罪的，但我“宁鸣而死，勿默而亡”的性格，不会因为获罪而不再直言。写小说，是另一种方式的直言。目前“四人帮”固然打倒了，但是今后“广开言路”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也就是说，因言获罪的可能性依旧存在，不一定哪一天，我还可能要进监狱。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她愿意与我结合，首先要有“送牢饭”的思想准备。如果万一哪一天我又一次因言获罪而被捕，她那边立刻宣布与我划清政治界线，那就不如今天干脆不要考虑。第二，我目前暂时还离不开劳改农场，而且我们是没有探亲假的三等公民，如果与我结婚，我最多每年只能回家住半个月，至少在几年内要忍受两地分居的苦楚与不便。第三，我一个月只挣 32 块钱，每月还要存十几块钱作为一年一度回家探亲的路费。如果与我结合，最好干脆不要孩子，如果一定要孩子，也只能靠她“独力”抚养了。

这样的结婚条件，在全中国来说，恐怕也是少有的。我这是破釜沉舟，一次性把丑话说在前面。因为事情明摆着，如果我不把这些不利因素统统摆出来，一旦遭遇到“不测”，再来做思想工作，可就太晚了。

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回信居然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你所提的三个条件，我完全接受。”她解释说：她知道这等于用她自己的政治前途来交换这桩也许会遭遇到许多艰难挫折的婚姻，但是她第一出于爱才，第二出于支持正义，她下决心这样做了。她说：如果她只求组织一个安逸的小家庭，如果想当“官太太”，这几年来给她介绍的对象中，不乏复员军人和机关干部，有的还是造反派的小头头儿。但是她的态度很坚决：“要我嫁造反派，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她坚持不考虑婚姻问题，主要也是为了避开这些造反派。既然十年时间都等过来了，当然要找一個与自己志同道合、有共同观点、共同语言、共同命运的人。

这件事情，她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包括她的父母与哥哥。她知道，只要与别人商量，可以预计几乎不会有人同意或支持。不过事后她也曾经征求过一个人的意见，是她的好朋友，缙云县法院副院长应章恩。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的情况，老应当时就预言：“这些受迫害的同志，早晚是会给他们平反的。”他是完全出于文革以后自己对形势的认识作出这样的判断的。有了他的支持，娟对自己的大胆决定更加有信心了。

## 七、时机并没有成熟

与婚事同时进行的，还有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前两册已经修改誊清，就在娟手里。我一方面夜以继日地修改誊清第三册，一方面让娟以作者的名义把前两册稿子寄给浙江人民出版社。因为我是浙江人，小说写的也是浙江省的事儿，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在浙江出版，应该是名正言顺的。11月3日，娟从新建把稿子挂号寄出。

在我看来，“四人帮”一被打倒，文艺的春天就会到来，因此我把我从1950年在四川开始创作直到1974年方才写完的一首长达3344行的长篇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也寄给了复刊不久但是发行量却达到一百多万份的《诗刊》。

《诗刊》的回信首先到来。他们看了稿子，觉得可用，要我到北京去修改。我傻乎乎地拿着编辑部的来信找分场部管教股的张干事请假。张干事看见这样的信，瞪大了眼睛，好半天这才说：“把你的稿子拿来我看看！”我依言把我的底稿送到了管教股。过了三天，我去催问，张干事瞪着眼睛绷着脸说：“你写的那叫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一句话就把我写了二十四年的一部长诗给彻底否定了。不但请假不准，连原稿也被扣留，一直没有还给我。

没过几天，《诗刊》编辑部终于把我的稿子退了回来，附信写得还算客气：“由于稿挤，发表长诗有一定困难，只好割爱了。”幸亏分场部没扣留这份退回来的稿件，不然，稿子全没了，二十四年的心血，可就付之东流也。

直到1981年10月，我调到了宝文堂书店当编辑，在东四北八条52号四楼上班，二楼就是《民间文艺》编辑部。一次认识了该刊的副主编吴超。由于我大哥也叫吴超，见了他不免多几分亲切。攀谈之下，才知道他原来在《诗刊》当编辑。我讲起1976年我与《诗刊》的这一段缘，吴超说：我的那部稿子，当年就是他处理的。他很欣赏，打算上，但是没想到我的所在单位以我的“摘帽右派”身份不宜发表作品为由加以否定了。当时发表作品必须经过“所在单位”的政审，他也没有办法。于是我就与他协商，宝文堂计划出版一套“绘图叙事诗”，已经有了马萧萧的《石牌坊的传说》，我的这部长诗也在计划之中，为了纪念他的“识诗人于劳改之中”，这部长诗打算就请他当责任编辑，他也欣然同意了。1985年，这部长诗终于由著名画家陈惠冠先生绘图，以《岷江三爪龙》

的书名正式出版了。

1976年11月下旬，我收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11月24日的来信，告诉我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已经审读通过，计划在年内出版。

收到这样的来信，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作品得到肯定，而且时间这样快：稿子是娟11月3日从缙云挂号寄出的，出版社最快也得在11月6日收到。一部八十万字的小说稿，仅仅半个月时间，至少要经过三个人通读并讨论，即使用的是“流水作业”的方式读的稿子，能够这样快就通过，不能不说是“神速”。何况当时已经是11月，他们居然打算“在年内出版”，决心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我有了长诗被枪毙的经验，心知这部书稿能不能成活，还两说着。

果不其然，没等我去找张干事，分场部张场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吴越，听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有这回事儿吗？”

我心知政审的公函又到了，也就实话实说：“是的，有这么一回事儿。”

“你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满不错嘛！我怎么不知道哇？”

我只好很客气地回答：“张场长，您住在东村，我住在西村。没事儿您难得到西村来走走，来了也只在队部坐坐，从来不跟我们见面，怎么会了解我们的事情？”

“你的小说写的是什么内容？”张场长没见过我的小说，不能像张干事那样用“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来一句话加以枪毙，所以必须先问问是什么内容。

“我写的是清朝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其实我的小说主题是反对血统论的，是用形象思维说明工农的子弟并不一定个个都好、地主的子女不见得人人都坏，并且全方位广角度地描写清朝末年浙南山村的风土人情，可是在他的面前，我不能不“拣好听的说”。

“你在清朝生活过吗？”张场长冷丁爆出了这样一句。

“张场长，我怎么可能在清朝生活过呢？”

“对呀，你既然会写小说，总应该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既然你未在清朝生活过，那么你所写的小说，岂不是缺乏生活基础，岂不是凭主观想象写的主观主义作品吗？既然你写的作品是主观主义的，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能让它出

笼吗？现在我代表党的基层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作品，我们不同意出版。”

张场长不愧是场长，至少他不像张干事那样，讲不出道理来，只会用“乱七八糟、什么玩意儿”来加以否定。面对这样的高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是以“党的基层组织”的名义出面的，我一个摘帽右派，三等公民的身份，还能够说什么话呢？我心里十分明白，此时此地，跟他讨论文学问题，百分之百是对牛弹琴，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因此我只好沉默。张场长见我不说话了，笑了一笑，接着说：“告诉你，文学是党的事业，你私自写小说，私自往外寄稿子，都没有通过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这是……这是……一种走私的行为，我还没有处分你呢！回去吧，往后别写什么小说了，好好儿劳动，通过劳动改造你的思想和世界观……”

从张场长办公室出来，我明确了一件事情：我的小说是成功的，至少是过关的。问题在于我的身份。我与赵植林商量对策，他建议我把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中青社出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姚雪垠就是右派。中青社既然可以出版姚雪垠的作品，也就应该可以出版我的作品(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姚老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点头，是“钦定”的)。

几天以后，稿子从浙江人民出版社退回来了，退稿信写得非常简单：“吴越先生：你的稿子，经过我们再次考虑，决定不出版了。”连退稿理由都不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双管齐下：立刻重新包装，以“楼兴瀾”的名字，用新建公社第五大队的地址，把稿子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已经不实行“政审”制度了。稿子经过四个编辑审读，两个说好，两个说不好。第五个编辑李荣胜(当时的编辑组长，现任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读完了稿子，拿不定主意。他正要调往《中国青年报》去，为了避免他的“关键一票”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只好“弃权”，没写出审读意见来就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个老编辑黄伊主动要求把稿子拿过去看看。他看了稿子，对稿子是肯定的。为此，他写出了审读意见，又把稿子送请刚刚落实政策回到中青社的前总编辑李庚审读。李庚排开杂务，腾出十五天时间来通读了全稿，写出了七千多字的基本上肯定的审读意见。一直到稿子通过，快要出版了，责任编辑黄伊竟然还不知道此书作者的真名究竟是吴越还是楼兴瀾！



## 八、最俭朴的婚事

“四人帮”已经打倒，婚事既然已经决定，我们觉得宜早不宜晚，打算在1976年年底把手续办了。

尽管娟的一家子都是党员，但是当时她自己还不是党员，而是被培养入党的对象。按照组织原则，她向党支部汇报了自己即将结婚的事。关于我的身份，她不想过早暴露，所以只说我在北京“地方国营”清河农场工作。为了搞清我的政治面貌，支部书记决定发文到农场外调，她当然不能表示异议，但是支书写好了外调信，她却要求自己寄，支书也没反对。她拿到外调信后却没有发出，而是锁在抽屉里了。

我这边立即打报告，第一要求请结婚假，第二要求开结婚介绍信。劳改农场对于二劳改的就业人员要求结婚，道义上是支持的，因为“婚姻无着”正是就业人员普遍不满的问题，因此只要“二劳改”们找到了对象，农场一定支持。第二天，管教干事就给我开出来结婚介绍信。

1975年，我回缙云探亲，已经把我几年来的积蓄用得差不多了。经过一年的“再积累”，也不过攒了一百多块钱，所以1976年年底，我几乎是两手空空地到了新建。不过清河农场的哥儿们听说我要结婚了，这个5块那个10块的(要知道，当时“二劳改”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元上下)，居然也收了105块钱的“贺礼”。我用这笔钱给娟买了一只手表，除此之外，没给她买任何东西，没给她的家人买任何东西，也没给我自己买任何东西。不过我在北京买了两条好烟，到金华又买了五六斤水果糖，这是娟点名要的。因为缙云买不到好烟，出的水果糖吃起来虽然一样甜，价钱也不贵，但是颜色太黑，不大好看。

那时候，从金华到新建还没有直达汽车，我必须先从金华坐公交班车到一个叫做“外堰”的小站，然后等待从缙云到新建的班车到来。这趟班车一天只开四次，所以等了很久，到达新建，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到肉店找到了娟，这是我与她第二次见面。她也没有通知任何人她要结婚的消息，店里也没有任何人认识我。她给店里人打了个招呼，就把我带到了她住的火腿厂仓库外面的那间小屋里。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间小屋。照我估计，这将是我们的新房了。屋子经过整理，铺上了新床单，叠着新被子，撤了天罗地网似的拉着的绳子，房间里干

净利落多了。

我们同时在床沿上坐下，我的第一句话是问：“咱们现在还没登记，你后悔不？要是后悔，还来得及。”

她笑了起来，说：“都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太晚了吧？何况我根本就不后悔！”

“既然你不后悔，那你就是我的了。”我把她拥进怀里，想给她一个吻，但是她把头偏了过去，说是“不会，也不习惯”。我也不勉强她，只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婚事再次砸定以后，她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与家人见面。她的哥哥在合肥，四个妹妹三个已经出嫁，家里只有一个十九岁的小妹。加上她的父母亲，全家一共四个人。家里似乎对她选择了这样一个丈夫并不太满意，或者是一家人都不善于辞令，总之是见了我都冷冷的，没什么话可说。在她家吃的第一顿饭，也是贫下中农的家常饭，基本上全是素的。

直到这时候，不但街坊四邻不知道她家来了一个新女婿，就连她家里人，似乎也没做结婚的任何准备。

吃过晚饭，她把我送到火腿厂她自己的房间里。我问她婚事将怎么进行，她叫我不必过问，一切都听她的安排。还没有登记，法律上我们还不是夫妻，我长途旅行，一路辛苦，她要我早点儿休息，她自己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她照常到肉店上班，忙过了清晨最紧张的那一阵子，她找个人代班，这才到宿舍叫我揣上两包比较好点儿的糖块儿，带我上公社登记去。

新建公社是个大社，下面有六个大队，相当于乡的建制，大院子里有许多房间。她先找到了公社书记黄金保。这是一个挺瘦的高个子中年人，烟瘾极大，把一口牙都熏黑了。据娟后来告诉我说，当时农村的人，凡是家里有婚丧喜庆，办酒席招待，按例都要请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到家里坐上席。一个大队干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有二百多天是在别人家里吃饭的，而且不喝醉了不回家。独有这个黄金保是例外，尽管他烟瘾很大，一个月抽烟的钱就要占去他收入的一半儿，家里生活相当困难，但从来不在别人家里吃饭。不过与娟的关系相当好。早先娟当民兵连连长，黄金保当大队支书，晚上一起出去巡逻，回来以后就在她家一起煮面条吃，也没油，只是酱油汤加点儿葱花儿而已。但就

是这样好的干部，文革期间还是挨整了。他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任的公社书记。难怪我刚一下汽车，就看见广场上挂着红布的横幅：“坚决拥护黄金保同志主持公社日常工作！”

娟把我介绍给黄书记，并献上了一包糖，黄书记听说这是喜糖，连说：“这糖我可得吃。”我连忙递上了好烟，尽管他从来不抽人家的烟，一天到晚就熏三毛多钱一包的“西湖牌”，但却接过我的烟去立即点上，并说：“这烟我可得抽。”接着就谴责娟，不该连婚事也向他保密。娟也有说词儿：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向食品站的党支部汇报了，是支书没向他汇报。再说，现在不是把丈夫带来请他当面审查、请他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还要请他喝喜酒吗？他呵呵笑着：“是你挑的丈夫，不用审查，准没错儿。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都挑了十几年了，不是好样儿的，你能点头？这手续，我去帮你办，这喜酒，我也一定要喝！”

说着，他就把我们带到了个姓江的文书面前，指着我们两个说：“你把他们的结婚登记手续给办了。”

在公社时代，一个文书，可不是连队里的“上士”级兵头将尾，而是书记不在可以代行书记职权的“大干部”。江文书当然是公事公办，伸手就向我们要结婚介绍信。黄书记笑了起来：“这结婚介绍信，是应该你开的呀，你怎么反倒问她要了？何况有我亲自带来，还要什么介绍信哪！”

黄书记的意思，是娟的介绍信就不用了，反正是本公社的人，谁都了解，何况有他在场，比介绍信还硬；江文书却错领会了意思，以为有书记担保，连我的介绍信也不用看了。因此立刻拿出大红结婚证书来，问了问我们的出生年月日，就把结婚证书递给了我们。连“我代表政府，批准你们结婚”之类的官话也没说。我说了声“谢谢”，娟取出一包糖来放在他办公桌上，就拉着我赶紧“逃跑”了——在这样的场合，如果不赶紧逃，是要四面被包围，简直无法脱身的。

(右图：1977年春节，婚后大雪天留影)

拿到了结婚登记证，我们就是合法夫



妻了。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新郎新娘应该挨家挨户亲自去分喜糖的。但是娟没让我出面，而是全权委托她母亲去办。她看看我带回来的喜糖数量不多，根本不够分的，又到百货店买了十斤一袋的两袋本地产水果糖，然后把我带回来的好糖和这些糖用一个大筐箩搀和在一起，这才打发她母亲出去分喜糖了。

喜糖一分，等于发布了结婚启事，街坊四邻和亲戚朋友们都知道了。于是就有娟的女友们登门来送礼。大家这才醒悟到：楼家昨天进门的客人，原来就是他家的新女婿！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新女婿的身份。因为据娟的介绍，我是个在北京某国营农场工作的缙云本地人，可是看我戴着眼镜儿，文质彬彬，显得挺有学问的，特别是伸出手来，红润而柔软，绝不像是干农业活儿的人，因此有人猜是下放干部的，有人猜是故意保密的，还有人猜是娟上北京告状的时候认识的某个大首长的秘书……

中午刚过，我的大姐、大姐夫、两个外甥、两个外甥媳妇儿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一行七人，按照当地风俗，用青麻布口袋挑着大馒头，作为男方的客人到新建贺喜来了。我母亲没一起来，因为她的老年性白内障手术不太成功，老眼昏花，行动不便，我与姐夫商量好了，等我们婚后，再到壶镇去接她。

尽管我们不想为婚事大操大办，但是客人登门，一杯水酒，还是应该招待的。此外，据说娟被“下放”处理之后，丈母娘曾经对天许愿，如果女儿有了出头之日，要以生猪生羊和大红金鸡对天还愿，如今“四人帮”被打倒，女儿于归，虽然冤案未曾平反，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因此也要提前还愿，以了心愿。为此，家里宰了一头大肥猪，又到市上买了一只羊。

下午 4 点，院子里点上了香烛，供着去了毛的生猪生羊和大公鸡，全家人都来对天磕头。我没有磕头的习惯，就作了三个揖，算是感谢老天爷的“天作之合”吧。

据说农村人请客，最难请的是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们。只有娟这次请客，却与众不同，只要打个招呼，不但统统都来，还带上好几个因公出差到公社来的县里干部——别以为人家是吃“蹭饭”来了，要知道，在那时，这可是天大的面子，一般的人家办喜事，县里来的“大干部”是绝不肯光临的。娟的二妹夫是大队长，交游广，善于辞令，请他负责接待客人；四妹夫是大队支书，在部队就当的是炊事员，善于烹饪，就系上了围裙亲自下厨掌勺。席上有公社书记

坐镇，村干部们虽然嘻嘻哈哈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却不像平时那样大喊大叫的，显得文雅多了。

我悄悄儿问娟：怎么没通知我们的大媒人徐子玲，才知道她已经调到景宁县她丈夫那里去了。

---

【闲读偶记】

## 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

胡庄子

《记忆》第22期（2009年5月14日）刊登了忻鼎亮的《中国科大的“雄师”与“井冈山”》一文，对1966年底至1967年初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而名动京城的中国科技大学群众组织“雄师”进行回忆。之前，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85期（“文革博物馆专辑5”）曾发表“雄师”负责人周平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参加“雄师”的经历和后来经受的苦难作过回顾。这两篇文章让我想起保存的一本1967年编印的“雄师”大字报选，便随手找了出来。

这本大字报选，名《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是北京工业大学“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战斗队1967年元月编印的。这本小册子，16开本，34页，手刻油印，印在粉红纸上，字如小蚁。“编者按”称：

在反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中，各样的跳梁小丑登台了。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他们的文章中见到的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尽管他们在口头上再三表白自己的“忠诚”，但语句中的措词总是掩盖不了内心中对现实不满的哀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造反派队伍内部，也有一小部分人为之叫好，科大的“雄师”战斗团就是一例。他们貌似公正，但实际上却是站在第三者甚至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等反动的

相对主义。他们欣赏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而是资产阶级议会的虚伪民主。他们也在□（引者注：此字不清）谈什么“阶级分析”、“破私立公”、“民主”、“团结”等等，但有的尽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乌托邦主义、民主主义……，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在革命深入发展之时，我们万万不可低估这些人，及他们□（引者注：此字不清）进革命队伍中的私货的毒害和影响。这些人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何尝不是在揪这些人吗？不过，在修正主义还有它的社会基础时，这种人又可能有新生分子罢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和这些人、这种思潮斗争。

。……

显然，这是一本“供批判用”的小册子。其中收录了大字报 9 篇，另有附录两篇。它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下了一套“雄师”的原始资料。《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目录如下（括号内是笔者注释）：

- 1、对若干问题的看法（署名：科大 612 陆仁安，1966 年 12 月）
- 2、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1966 年 12 月。经考证，这篇文章的作者为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和周平）
- 3、分歧在哪里？（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1967 年 1 月 3 日。考证，作者为周平）
- 4、革命的对联不容污蔑（署名：红卫兵葛胜宝，1966 年 12 月 13 日）
- 5、对“尖端观点”的表态（署名：《红灯》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
- 6、“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是反动标语吗？（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11 红小兵，1966 年 12 月 7 日 )

7、中央文革必须触及灵魂、破“私”立“公”，发扬大民主，发动群众来一次运动大总结——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12 月 14 日晚 24 时）

8、错误的失败的大会（署名：《学闯道》战斗组，12 月 15 日）

9、“反了！”（署名：雄师独立团，1966 年 12 月 31 日）

附录：雄师的主要干将及其“尖端观点”简介（主要介绍了周平、江晓东的简历和观点）

北京工业大学中南海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

看了上述大字报，也产生一些疑问。

一、“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文革的吗？阅读原文（注：周平说，她没有保存“雄师”的大字报，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中也没有收录“雄师”的大字报。本文将“雄师”的两篇大字报附后）可以清楚地看出，“雄师”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更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只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做法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罢了，而且这些意见是“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文革后，科大党委在给周平等人平反的文件上讲，“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周平当时就说：“‘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中，把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不同意见打成“反革命”，显然是“无限上纲”，把意见“反文革”的“危害”看得过于严重了。文革后，对红卫兵、造反派张贴的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般评价都比较高，认为他们比较早地批判了中央文革，是否定文革的先声，这又把

大字报“反文革”的“意义”高估了。

二、“雄师”成立于何时？忻鼎亮文称：“雄师”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周平的文章中没有谈及成立时间，但她说“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可以佐证“雄师”成立于12月底。但《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中收录的大字报，最早的在1966年12月上旬。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雄师”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周平说：“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忻鼎亮文称，雄师“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周平、冯正永”，没有提到江、黄（江估计就是江晓东）。这些名字中没有“反革命大字报选”中的陆仁安、葛胜宝。陆、葛是不是“雄师”成员？如果他们不属于“雄师”，为什么“反革命大字报选”把他们也列入“雄师”之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雄师”比较接近？

再说几句好像是题外的话——

“雄师”的主要成员之一周平因“雄师”而受害，受批判，坐牢，还被打发到农村劳动。“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这里。”“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化肥厂去吧？就这样我到了化肥厂。”“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回想着往事，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我真傻，我当初干吗要到处乱讲，干吗要把什么都承认了，我真傻……’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哎，都是我不好……”

我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酸而亲切。我熟悉西平，西平在河南的中南部。周平说的化肥厂，是西平县化肥厂，在县城郊区（西南方向），当时周围都是庄稼地。能在化肥厂上班的工人，几乎都是通过“开后门”进去的，没有关系是进不去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多次拉着中原农村常见的架子车，走几十里路到那里拉化肥，劳累而兴奋，毕竟是进趟城啊！在小城的郊区，我看到城里的人和



他们的孩子在庄稼地边悠闲地游玩而不是干活，我这个农村孩子心里眼里都是羡慕。心想，他们真幸福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呢？我不知道我看到过周平和她的女儿没有。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知道她的经历以及内心的苦恼和挣扎，一如她不知道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的农村人的苦难和挣扎一样……

2009年10月31日下午

---

【故纸堆】

##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的两篇大字报

### 《中央文革向何处去？》

#### 一、前言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从六月一日算起，到现在已快七个月了。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大举措，它也必将对世界的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七个多月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天变、地变、人的思想变，一个大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新纪元开始了！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前面的道路还长着哪，走过的七个月，才是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回顾七个月来运动，经过了多少曲折，多少反复。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做好把围攻、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坐牢、牺牲的准备。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重重阻力，奋勇向前。

在七月后的今天，让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周围的现状。

#### 二、问题的提出

前几天，在北京刮起一股“抓人风”。北航红旗抓了，三司抓了。一个个小“反革命分子”被送进了公安部门。

这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是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还是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

### 三、主流和逆流

关键在于对形势怎么看，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抱什么态度。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群众起来批评中央文革，这才露出一点儿苗头，但是十二月中旬，以北航红旗、三司为代表，把这种情况称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满街满巷都贴上了“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要砸烂它的狗头”之类的标语，随之而来，就是一个大逮捕，似乎没有这个反击，右派真要翻天了！

这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近两个月的运动。

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十月六日首都一个大会，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锋号，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北京和全国各地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批判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

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不适当地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组织。

在批判中缺乏经常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是采用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如骂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抢材料和广播器材等，砸××司令部、解散×××总部等。这些也就造成了群众之间的一些对立。（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对立现象的发生主要来源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开始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提出要破私立公的问题，陈伯达同志提出对犯有路线错误的人的几个界限。这是把运动提高一步，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来的指示。但可惜没有很好地执行，少数派中的一些人继续采用原来的一些错误作法。

十一月三日，林彪同志在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特别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群众中，在群众互相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

加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的面前。”又指出：“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把自己从‘我’字中解放出来，从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局限性里面解放出来，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共产党员，一个识大体、顾大局、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某些人并没有听，运动中的不良现象在发生着。

这些问题如果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深入群众，原来是不难发现，不难解决的。中央文革小组运动初期曾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少了。因此他们的指导也越来越不得力了！他们的眼睛只看着一些“左派”，形式地执行阶级路线。这样言路不广，听不到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下层同志的意见。

事实上，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队伍都在分化，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却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原来的多数、少数派队伍，过多地依赖少数派，他们想通过少数派来领导北京的运动，用北京的运动来指导全国的运动。而事实上运动的发展却远远地跑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的前面，北京的运动还没有外地运动扎实，外地已跑在北京前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是有意见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

十一月十日，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对干部们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号召干部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是多么伟大的号召，也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一针见血的批评。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很好地接受批评，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

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毛主席的话在群众中有无限的威信。他们眼看着运动的现实，心里翻腾着毛泽东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回忆着文化大革命的往事，在默默地总结着。

因为工作组撤走以后，北京的运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十六条上说得好：“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因此，群众对运动的意见，便自然地找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例如：

讲话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首长过多地发表讲话，过早地定调子、作结论，没有很好地号召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十六条。根据运动的现状，独

立地分析问题，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结果助长了群众中某些人的奴隶主义，各种意见不能充分发表出来，就不能自己教育自己，一些工作搞得不深不透。

中央文革小组对老少数派依赖过多而批评帮助不够；因而使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不能及时纠正，造成损失。而对多数派又缺乏足够的革命热情，帮助他们改正过去的错误，对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缺乏肯定。

中央文革小组在指导长征串连上缺乏全面的考虑。

在指导工人运动上，中央文革小组表现是跟不上形势，放手不够。11月11日陈伯达同志在送上海安亭车站的电报又没有突出政治，给工人运动泼了冷水，引起工人同志的不满。

另外，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了错话，又不敢公开承认错误而想偷偷改。等等。群众自然有意见，就要发言，就要写大字报，这是多么好的形势啊！群众自己起来，勇敢地探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道路。这是前阶段运动成果的最集中体现，是群众革命精神的高度发扬。这是主流，是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

在这革命风雨到来之前，是满腔热情地爱护和提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鼓励群众的批评，还是只看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到里面浑水摸鱼的坏人而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打击，这是检验一个人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表现。

作为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欢迎群众起来总结。可是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毛主席语录）

在向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同志中，有些原来处于多数派地位的同志，现在有怒气，他们的批评，采取的不是完全正确的态度，而是有情绪。但正是由于这些同志所处的地位，他们往往敏锐地抓住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的缺点，他们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死不回头，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坏分子目无法纪，进行武斗，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它进行反击是必要的。逮捕那些杀人行凶的分子，发动群众起来批

判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打退这股反动逆流。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看到的就是那股逆流，就是一些同志在批评时的情绪，却偏偏看不到那些合于运动发展需要的正确意见。而把这一律看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看成右派翻天。这样，他们也就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开大会，造声势，抓人，把那股主流也打下去了。之后，抓人显然引出了严重的后果，领导上显然在想纠正。现在又提出打倒刘邓路线，贴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大标语，想把运动扭入正轨。但是伤痕犹在，群众积极性怎么发挥？以前的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连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糊里糊涂呢，怎么谈得上彻底批判呢？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跟着跑，要么就只有“没事可干了”。

#### 四、这是一种什么运动

两个月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已越来越远地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想当初，毛主席下令撤消了工作组，中央公布了十六条，群众一经和毛主席正确路线见面，思想大大解放，运动大开展了。

可是现在，许多人思想上又蒙了一层灰影，摸不清形势，又不敢说话，“不要我也上了反革命的当”。许多人感到压抑：“我也和×××有相同的观点，说出去岂不也成了反革命，也要逮捕了。”

想当初，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群众在一起，那时，他们的讲话对我们是多么亲切，真实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可是现在，他们的话里那么捉摸不定，有时甚至与群众的愿望完全相反，却还是拉着群众运动的鼻子走，越拉越别扭。

如果说十月中下旬，北京的群众运动已开始向运动群众转变，那么现在却有连运动群众也运动不了的苗头了。昨天已开斗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今天又在搞刘少奇、邓小平，明天又要去揪×××的后台。东轰一炮，西刺一枪，而广大群众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人昨天去跟着呼几句自己也不太理解的口号，今天会也没开完就跑了回来，明天索性不去了。

北京的大专院校里，已不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寥寥无几的

大字报和大标语也吸引不了人，许多红卫兵组织和战斗队已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战斗集体，而成了事务所、印刷所，连北航红旗也有人提出没事干了。许多同学成天要传单，“研究”中央首长讲话，默默地寻求方向。

这是一种什么运动？它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

###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防止我国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所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也在于此。

而中央文革前阶段工作中的许多措施，是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的。如果不纠正错误并消除其影响，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夭折。

文化大革命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要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发动群众来一个大总结运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么继续过去的错误，使文化大革命走过场。两种办法，两个前途！

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听毛主席的话“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拼命努力地向前，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1966年12月

## 《分歧在哪里？》

### 一、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出来以后，听到各方的反映和意见，反对我们的同志和我们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十一月下旬以来北京市的形势如何估计。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我们认为当时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运动内在矛盾必然爆发的反映，不可避免地

里面会个别的坏人浑水摸鱼，但它绝不影响群众运动的主流。群众自己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探索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是群众革命主动的表现，同时对前阶段运动一些错误的看法也发表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大民主深入人心的体现。形势好得很。正如林彪同志讲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就是合理的。”应该根据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正确的加以引导，开展群众性大辩论、大总结、大整顿，使群众在大辩论中辨别是非，加强团结，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一步。

但是以三司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某些组织却把这些统称为资产阶级路线的疯狂反扑，看成是右派翻天。因此，他们用大抓人的办法来进行反击，企图把这股风压下去。

我们认为当时的形势好得很，而他们认为，形势糟得很。究竟是谁把形势看得一团糟？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而分歧的实质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不能实现毛主席的大民主，要不要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上来，归根结底，就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要不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 二、把运动提高到毛泽东的水平

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公与私的斗争。随着运动进入到新阶段，在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少数派也会分化。根据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原则，我们坚决反对用固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多数派和少数派。

自从一月份（注：应为十月份，疑为刻印笔误）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角，中央文革肯定了原少数派的观点是正确的，支持了革命的少数派，少数派翻身了，他们的地位变化了，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当少数派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或在群众刚一发动起来时采取的一些过火的偏激行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是绝不应指责的。在新条件下，把运动逐渐提高到毛泽东

策略思想的高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正因为如此，江青同志就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要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

少数派中的一部分人，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帮助受蒙蔽的群众认识自己的错误，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不断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以他们为核心，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是少数派中的左翼。少数派中还有极少数人，他们本来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个人主义者，是既得利益者。在他们被压迫被打击时可以斗争得很勇敢，很坚决，一旦他们翻过身来，取得领导权以后，就认为大功告成，不想继续革命了，因袭守旧，以“左派”自居，无视多数派群众的革命要求，歧视打击原来犯过错误的同志，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下，采取了一些形“左”实右的做法，他们说×××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要解散，去砸××司令部，他们强调揪个别人的责任，而不愿意做一些深入细致的争取群众的工作，更没有把斗争上升到破私立公的高度。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个月后，为什么有些人还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不清？为什么群众中的对立情绪还远远没有消除？为什么原来的一些敢说敢干的闯将现在却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失去了当年朝气蓬勃的劲头？为什么有些人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来干革命，而是靠小道消息，这就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的队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主要还是资产阶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私”字。运动发展到现在一个阶段，已向我们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破私立公的新水平，运动就搞不下去。不破私立公，就不能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形成革命化的左派队伍。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句话，不破私立公，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按照林彪同志的教导：“不但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动力，而且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在斗争中学好老三篇，促进认得思想革命化。

### 三、批评中央文革的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广大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进行批评和有效的监督。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自古以来都是“官为民父母”，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道理颠倒过来了，“民为官父母”，“官”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民可以造反。

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参谋部的中央文革小组，也不例外地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判。而且由于中央文革实际上在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有些同志与主席思想有一段距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会对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需要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文化革命以来，我们打破了多少框框，党支部可以批评，校党委可以批评，院党委可以批评，省市委可以批评，中央局可以批评，中央领导人也可以批评。今天中央文革不可以批评这个框框我们一定要打破，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打破这个框框，才能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大民主。

从七月份以来，中央文革直接领导北京的文化革命，她深入群众支持了革命派，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十月中旬以来，我们逐渐感到中央文革在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没有及时地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也就是破私立公的水平，没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及时发现并依靠新的左派，对少数派的错误批评和帮助不够。对多数派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不够、积极引导不够，不善于听取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因而他们也就逐渐脱离了群众。

十月中旬以来，中央首长过多地讲话，使北京运动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央首长讲话的指导下，少数派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今天开十万人大会斗彭、罗、陆、杨，明天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群众只有通过首长讲话和三司、北航的动向来确定运动的动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群众开始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对中央文革提出了批评。他们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中央文革也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实践中有所改进，例如有些同志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及时地制止了抓人风，在12月23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

，对“对联”的评价也作出了□□□□□□□（注：以上七字模糊难认）他们对群众的批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们口头上也欢迎批评，但却没有一次公开肯定这些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一次公开表示接受群众的意见，实际上还是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把群众中不同意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陈伯达同志曾经引用过一个退休老工人的讲话：“革命的地委还用我们去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央文革。革命的中央文革还用我们去保？中央文革如果能接受群众的意见，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将给全国各级领导树立一个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的光辉榜样，毛主席说“有些同志，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判，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又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我们希望中央文革小组采取必要的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公开现行反革命材料，以便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造大民主的气氛，使群众敢于讲出心里话。

我们接受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对于他们的错误领导我们坚决抵制，坚决提出批评。中央文革就是要广大群众的批判和监督。

#### 四、结语

我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听到不少的反对意见，我们欢迎大家针对我们的观点展开答辩，思想上的问题决不是把对方的观点任意上纲、歪曲、扣帽子、以势压人的方法能解决的。至于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的卑劣做法更是不值一顾，无损于我们的一根毫毛。我们准备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主席啊，我们日夜想念您！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 1967年1月3日

---

#### 【友情链接】

按：2009年12月6日，一个对文革研究有兴趣的书吧——如梦轩文化长

廊在武汉开业。这是李乾在开业仪式上的发言。李乾，1949年12月生，湖北宜昌人，文革时为初中六六届毕业生。文革中为武汉市造反派学生组织“钢二司”基层组织负责人，1967年12月4日武汉红旗中学（原武昌实验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委员。次日为“捍卫革命新秩序”，带人枪杀了两个“小流氓”（即武汉有名的“一二·五事件”），此时正值他年满18岁前夕，因犯杀人罪入狱。1976年7月被判刑二十年（服刑期间减刑二年），1985年出狱。著有反思与忏悔的回忆录《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已由美国柯捷出版社出版）。

## 良知的坚守者——写给如梦轩

李 乾

当昧心邀宠、苟且偷安成为文史界衮衮诸公的流行曲时，在草根中却有一群虽然清贫却十分清醒的思想者坚持跋涉在反思历史的崎岖小路上；在权贵和资本日甚一日地将这群人抛向社会的边缘时，良知和理性却让他们义无反顾地登上为子孙后代保卫记忆的舞台，并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主人公哈姆莱特最著名的独白，表现的是他在重压下的苦闷与彷徨。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提这个命题时，面对的却是这样的一个残酷拷问：如果一个民族听任自己的历史充满虚假和空白，那么这个民族是仍在生存还是已经被毁灭？

正是出于这样深深的忧虑，一大批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思考者在为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忆而默默地坚守着。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这样的坚守者都不乏其人，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绵绵不绝的坚守者，才让任何权势者在历史面前都不可能一手遮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永远不会被毁灭。

在保卫记忆的努力中，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接之际，如梦轩破土而出，应运

而生，她是“海纳百川”（注：“海纳百川”是一个博客，以反思历史，特别是知青史和文革史为主，一些武汉的老知青喜欢光顾）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更是一页崭新的篇章。应该感谢保安、李江、秋丽、零加良、莫安德、童青山等一大批为“海纳百川”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的朋友们，更要感谢杜良怀的执着和奉献。正是有了他的创意和锲而不舍的努力，如梦轩才如期出现在我们面前。

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如梦轩这个宁馨儿的诞生，现在她只是一棵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稚嫩而脆弱。但任何参天的大树都是从稚嫩成长起来的。我们期待着，期待着明天，期待着如梦轩文化长廊枝繁叶茂，香飘千里的明天。

---

【简讯】

## [《新发现的周恩来》即将出版](#)

[司马清扬](#)

由笔者和欧阳龙门合著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上下册），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为编年体和专题两部分。编年体始于反“反冒进”，终于周恩来去世。这部分主要探讨了周恩来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表现，以及建国后毛泽东在先打倒刘少奇还是先打到周恩来上的反复。这部分以大量的史实论证了周恩来是文革的“总管家”。本书还深入探讨了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周恩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在反“反冒进”中准备替换周恩来的人选。

专题共有十二个部分，特别是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保人”和在中央专案组的作用做了深入的探讨。以贺龙专案为例，周恩来深信贺龙在 1929 年的通敌叛变为真，因此在贺龙 1974 年的平反时留下尾巴。

本书依据的材料，除了大量的有关人员的回忆、传记、年谱，知情人的讲述之外，更有不少鲜有披露的档案材料。诸如乔冠华的交代材料、章含之的口述材料、张玉凤的口述材料、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时的记录，军内机密、绝密刊物《工作通讯》、总参三查三整材料、王洪文的检讨等等。参考文献超过 2600

件。

笔者认为，周恩来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作为一个无法超越历史条件限制的人——政治家而存在。笔者期望读者能在官方宣传的周恩来形像之外，获得一个崭新的、立体的、完整的、真实的周恩来形象。

由于是业余写作，缺乏充裕的时间进行推敲，在某些史料的考证上未必完全得当，笔者深望有识之士给予批评指正。

---

## 【编读往来】

### 一、庄菁瑞来函谈家庭专辑：

上期家庭专辑的推出开辟了文革研究的新领域。研究文革的人，似乎都不太注重这个方面，其实，从家庭，亲情这样的角度，更容易深入本质来研究文革对伦理、道德、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面貌所带来的严重冲击和破坏。

文革时代，那些年轻人的反叛，冷酷，其根本原因是49年后，共产党对国民的一贯“教育”所致。不仅是这些年轻人本身，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样的教育。文革中展现出来的这种教育的结果，让这些父母们身受其害，这样，才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冲击，才有所反省。只是代价太大，太沉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成年之后，退休之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当初所为感到悔恨。摧毁一个东西很容易，建成一个东西则很难。社会伦理、道德、人情关系等更是如此。我们今天的社会，到处都能够轻易地看到文革，或者说是主旋律一贯教育的后果。人和人相处都没有真情，更没有真话，整个社会是“假”，吃的是有毒的，用的是假冒的，文字是抄袭来的，说出来的话，也是忽悠人的，连感情都能用银子买。整个民族都没有道德概念。看看我们的文艺作品，哪部大片能有个鲜明的主题意识？全是一片混沌。这一

切，都是我们的党，长期以来改造思想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文革的流毒。所以，研究文革，这样的角度和方向是不可缺少的。

## 二、赵晓铃来函谈家庭专辑：

这期真好,感受很深。除了不易像老鬼那样激烈外,类似刘涛式的举动,当初我也会的吧。而且,不仅是我,那会儿的大中学生,基本人人都会。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当革命成为时尚的时候,人性、亲情会受到怎样可怕的扭曲。一直感觉,文革前的中学生,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老三届”,是狼奶教育的某种顶峰。当年的中学生,如今的退休老人身上,至今有些东西让人难过。这些东西与我们青春期的教育太有关系了。

## 三、马文蔚赐函简评本刊：

我赞成一位读者说的，这刊物能存在，就很不易。回忆资料渐多渐实，总归对将来全面深刻的反思有重要意义。有一文说到施义之，正巧我刚读了朱学勤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此人。有时“生活比文学更文学”，人是复杂的，那年代人的角色也是复杂的，读人读历史都不能简单化。

## 四、顾训中给《记忆》编辑的一点建议：

从2008年9月13日创刊以来，《记忆》已经出版了近40期，平均每月2.7期。如以每期5万字计，已经发表了200余万字的文革研究文章或资料。这对于只有一个半人（一位兼职，一位刚刚退休）的编辑团队而言，令人感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记忆》已经成为海内外文革研究者和关注者信赖的家园。

或许也是因为这种状况，在我周围的朋友中有人反映，近期《记忆》中有些

文章过于冗长，不耐阅读；刊期过频也造成来不及细读。有鉴于这些情况，建议《记忆》能否在新的一年里按月出版，以减少期数、确保并提升质量。如果因周期延长造成稿源流失的可能，是否可以通过一些办法巩固作者队伍。例如，定题定人写作，聘请特邀作者，提前发布下期要目，等等。

期待在新的一年里，《记忆》更上一层楼！这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 五、《记忆》编辑的答复：

欢迎广大读者就顾训中先生的建言发表意见。我们将择善而从之。